

# 1930年代初期東亞區域經濟重心的變化 ——日本擴張輸出與中國經濟蕭條\*

李宇平\*\*

## 摘要

一般認為，1930年代中國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位置，與西方經濟牽扯不深，不必然捲入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中，然而當時中國仍深陷於恐慌蕭條的境地。本文試圖說明中國在1930年代初期經濟陷入低迷，與深陷於大蕭條的西方核心工業國家難脫關係，卻也未必全盤源自西方經濟的衝擊，與亞洲本身，特別是日本的歷史發展，不無關聯。本文說明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商貿網絡在其中扮演的媒介傳播角色。一方面這可以說明亞洲經濟與世界經濟具有桴鼓相應的關係，而在另一方面，這同時顯示亞洲經濟有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獨特發展。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亞洲的衝擊可能反映了此一全球性經濟危機具有某些區域性特色，為前人所忽略。

1930年代以前大中華經濟圈在亞洲一枝獨秀，當時以其為中心，周圍環繞著許多小經濟圈，這些小經濟圈透過香港、新加坡、上海等仲介

\* 本文曾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補助，謹此致謝。本文曾於2002年3月21日近史所學術討論會，2002年4月30日至5月1日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合辦之「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啓示」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8月2至9日日本鹿兒島國際大學地域綜合研究所舉辦之「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形成史」學術研討會宣讀，先後承蒙陳慈玉、林滿紅、陳永發、翟志成、黃自進、葉其忠、陳來幸、賴建誠、宋成有、章英華、中村哲、堀和生、沢井實、王玉茹諸位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至為銘感。作者同時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提供修正意見。

收稿日期：2003年5月26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年12月18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轉口港，與中國維持若干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做為一個多元的交易網絡，歐洲商人也利用東亞華商交易圈，形成了一個把香港、新加坡做為孟加拉灣、南海、東海之間許多小經濟圈的轉口貿易與金融中心。1930年代，日本積極擴張對外輸出，以直航的貿易路線與亞洲各地維持密切聯繫，日貨在亞洲各地取得壓倒性優勢，終將原有各小經貿圈整合於帝國的經濟勢力圈。亞洲內部商貿網絡開始發生變化，阪神、臺北、雅加達因運送日本商品而形成的新興貿易網路，有愈趨發達之勢。相對而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集散中國、甚至歐洲商品連結成的商貿網絡，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亞洲經濟從以大中華經濟圈為核心的多元經貿圈，走向日本帝國經濟圈獨霸一方的局面，說明趨於蕭條的中國經濟正面對一個蒸蒸日上的日本帝國，亞洲經濟秩序的核心從而決定性地由中國移向日本。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 1930 年代美國實施白銀政策，導致中國大量白銀外流，對中國經濟傷害至深，是中國捲入世界經濟大恐慌的重要原因。1930 年代，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左右亞洲國際經濟秩序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美國同時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手國，白銀外流在形成中國經濟恐慌的原因上，不可否認地仍具有第一義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表示日本此一中國第二大貿易對手國，對中國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具舉足輕重的意義。本文說明 1930 年代日本商品對外採取一種低價取量的行銷模式，在貿易總價上遠不及歐美各國龐大，但薄利多銷，可以爭取較大的銷售數量，擴大市佔率或市場規模。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如此開擴商品販路的行銷模式，使日貨的傾銷嚴重威脅國貨出路，並導致中國經濟蕭條的局面。相對於以白銀危機來解釋中國經濟危機的西方史觀，本文有關日貨傾銷的論述，或許可以說是從亞洲觀點出發的東方史觀，對中國經濟蕭條成因的另一種解釋。

**關鍵詞：**世界經濟大恐慌、亞洲國際經濟秩序、集團經濟、日本、大中華經濟圈、商貿網絡、區域經濟重心、殖民地工業化論、亞洲內部貿易論

## 一、前言

一般認為，1930年代中國處於世界經濟邊緣位置，與西方經濟牽扯不深，不必然捲入世界經濟大恐慌之中，然而當時中國仍深陷於恐慌蕭條的境地。<sup>1</sup>學者以為，造成1931年後中國經濟陷入蕭條的原因可以具體歸諸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1932年長江大水災；1934年美國實施購銀法案，造成白銀大量外流；1931年底國際銀價止跌回升，對銀本位中國的巨大衝擊。<sup>2</sup>上述原因說明，中國在1930年代初期經濟陷入低迷，<sup>3</sup>與西方深陷於大蕭條的核心工業國家難脫關係；但中國經濟危機的形成也未必全盤源自西方經濟的衝擊，與亞洲本身，特別是日本的歷史發展，不無關聯。本文嘗試說明以日本為核心的亞洲商貿網絡在其中扮演的媒介傳播角色。一方面這可以說明亞洲經濟與世界經濟具有桴鼓相應的關係，而在另一方面，這同時顯示亞洲經濟有其相對於世界經濟的獨特發展。世界經濟大恐慌對亞洲的衝擊可能反映了此一全球性經濟危機具有某些區域性特色，為前人所忽略，此為本文撰寫旨趣之一。<sup>4</sup>

<sup>1</sup> 儘管1930年代世界經濟發生大恐慌時，中國是否發生恐慌，學者尚未有定論，但確有數位經濟學家，如Milton Friedman、Arthur Salter、王業鍵，都發現中國在當時確有相當程度景氣蕭條的現象。他們認為，中國經濟不景氣之指標可具體由國際收支、價格水準、貨幣數量三者之變動，及其間相互變化的關係得知。論者且以為中國經濟恐慌乃以貨幣收縮為主要經濟現象，致演變而成物價下跌、景氣低迷，而根本癥結可歸諸國際收支之逆差。此誠如Milton Friedman及Anna Schwartz所說：「國際收支潛在之逆差，由白銀輸出彌補平衡之，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國）國內通貨供給之不足」；Arthur Salter亦稱：中國「國際收支之逆差必然與相當數量貴金屬（金、銀）的淨出口同時發生。」見Arthur Salter, *China & the Depressi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4); Milton Friedman,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1(1992), pp. 62-83; 王業鍵, 《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 1644-1937》(臺北: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1981); 日本學者木村增太郎也認為中國在1930年代發生恐慌, 曾著《支那經濟恐慌論》(東京: 改造社, 昭和12年)。

<sup>2</sup> 王業鍵, 《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 1644-1937》, 頁51。

<sup>3</sup> Yen-chien Wang,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China's Monetary Reform in 193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卷9, 冊下(1978), 頁346。

<sup>4</sup> 學者認為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 對世界經濟造成全面性的衝擊, 可參考以下著作: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19-1939* (London: Allen Lane, 1986). 世界經濟大恐

亞洲商貿網絡的存續發展，與「大中華經濟圈」的繁華滋長互為依存。在亞洲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約定俗成的觀點多指僑居海外之華人，以生產、交易、消費本國產品為核心，所形成的以中國經濟秩序與價值為核心，並由華人主導的經貿體系。此一經濟秩序進入 1930 年代後，即面臨日本帝國的競爭、對立與挑戰。本文以為，日本於二次大戰前積極策動的南向及北進政策，不只使日本商品在中國市場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從而影響國貨產品的交易與銷路；與此同時，它更改變了中國對外的經貿關係，特別是中國與華僑大本營東亞之間長久以來的經貿關係。換句話說，1930 年代日本對外擴張轉趨積極，破壞了中國對外移民網、通商網及匯金網的延續與發展，影響及中國沿海的市場暨區域分工體系，使亞洲國際經濟分配體系中心發生決定性變化，可以見諸亞洲重要商貿路線與商品市場的興衰消長，<sup>5</sup>這是 1930 年代中國經濟陷入蕭條的重要指標之一，此為本文撰寫旨趣之二。

學者討論二次大戰前日本對中國經濟所進行的擴張與侵略，多半從九一八事變暨日本對華北進行大走私這兩項行為的探討出發，將討論焦點集中在日本與東北及華北的經濟關係上，認為日本不僅搶奪了滿洲市場，在透過徹底重組的過程中，還成功地將滿洲市場急速擴大。日本且試圖透過分離華北，將華北納入日本與滿洲國的經濟圈中。<sup>6</sup>然而此一論點僅係從地緣關係出發，側重日本北進政策對鄰國中國經濟的衝擊，在研究觀點上也多依循統治和從屬、剝削和抵制的對立思考框架，認知或批判某些促使中國經濟衰退的背景因素，以及日本與中國、亞洲的關係。固然，我們不能完全否決意識形態上

---

慌襲捲歐美之際，非洲也難倖免，可參考：Ian G. Brown, ed., *Economics of African and Asia in Inter-war Depre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5 岡崎幸壽，《海運》（東京：ダイセメント社，1938），頁 122 已提到，一次大戰後，亞洲海運市場重心有由上海轉移至神戶的傾向，但在 1930 年代可以見到多個遠東中心市場連結成的商貿網絡發生變化，這也就是亞洲重要貿易路線的移轉。本文重點論述之一，即是商貿網絡與商貿路線所發生的變化與發展，使大阪、神戶所居亞洲經濟重心的地位得以確立。前此研究多以日本為中心，本文則嘗試從中國中心的角度進行觀察。

6 堀和生，〈東亞的兩種資本主義〉，「兩次大戰期間的中國經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2001 年 11 月 23 日。

將日本視為帝國主義的歷史研究取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輕忽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此一側面在統合亞洲地域經濟，改變亞洲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事實上，日本的南進政策從區域經濟分工的角度來說，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也不可小覷。吾人不能輕忽 1930 年代中國與南洋關係<sup>7</sup>急速衰退的過程中，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亞洲區域經濟整合與中日經濟地位消長的關聯。中國資本主義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可能是在互相補充的基礎上形成的。本文因此是在補充及修正前人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評估日本南向北進政策，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商品市場及商貿網絡的衝擊，藉以明白 1930 年代中日之間經濟危機的淵源，此為本文撰寫旨趣之三。

本文第二節側重背景的探討，第三、四節探討日本的經濟拓張對中國本部的衝擊，兼及中國與東北滿洲國及渤海灣區商貿關係的變化。第五、六節則討論日本的經濟擴張對中國與南洋經濟關係的衝擊。第三、五節側重商品市場變動的觀察，第四、六節側重商貿網絡變動的觀察。第七節結論部份則嘗試推敲其在亞洲經濟史上的特殊意義。

## 二、日本對中國與南洋貿易的趨勢與特徵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期間，日本貿易反方向地快速擴張，成為全世界經濟的一個啞謎。其他國家經濟從恐慌蕭條中恢復，主要係在國內，而日本則大部份集中於對外貿易，其他國家只能恢復所失去國外市場的一部份，而日本整個貿易竟達不景氣之前的水準，且顯出了驚人的進步。<sup>8</sup>1932 年後，日本貿易恢復，卻具有一些新的現象，即日本不只迅速地在非洲、近東、拉丁美洲等低價的新市場上發展，在遠東舊市場上，因經濟蕭條而喪失的，在

7 因為中國對南洋的輸出，大部份是為華僑所吸收，南洋僑民的貿易和國內貿易沒有多大區別，南洋和中國經濟關係十分密切，此一觀點可見高事恆，〈中國與南洋貿易之展望〉，收入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上海：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1936），頁 20。

8 畢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 年 12 月 17 日，第 14 版。

1933年也迅速復甦，且與非洲、中美、南美，及西部亞洲這些新市場相比，1930年代日本在亞洲輸出價值所佔的百分率，始終保持著優越的速率。就洲別論，若以日本在1931年的輸出價額為基數100，則按其增進速度，五年中對澳洲輸出額指數，至1935年增至355，對非洲增至301，對亞洲增至258，對歐洲增至252，對美洲增至144，全亞洲輸出的增加速度僅列在第三位。然而就商品輸出總值的各洲分配率變動來看，則亞洲1935年對於1931年增加11.1%，其次非洲則增加2.2%，再次為西部亞洲增加1.9%。<sup>9</sup>日本於此非常時期的輸出貿易，不僅僅於新市場的猛攻，尤要於舊市場的穩固與推進，因為新市場的輸出價額從1929之4.8%，增加到1935年之15%，舊市場雖從1929年之95.2%，之後降為85%，但仍佔了絕大比例。<sup>10</sup>又由世界貿易的比率來說，歐洲地區貿易總值由1931年的57.5%，降至1932年的56.1%，美洲貿易所佔比率由21.9%降至21.8%，然而亞洲地區的貿易所佔比率卻反由15.4%增加至16.1%。<sup>11</sup>可見19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期間，日本貿易的推進，是亞洲地區貿易相對地呈現擴張之勢的重要因素。

然而就1930年代亞洲經貿圈而言，日本帝國與帝國圈內臺灣、朝鮮與滿洲國之間的貿易，確實繁榮而密切；與此相比，日本與帝國圈外中國、東南亞之間的貿易關係，明顯較少，但貿易總額持續攀升。<sup>12</sup>日本此一後發的帝國主義與其殖民地間特殊密切的經貿關係，顯示在對待殖民地的方式上，日本帝國與先進帝國主義有所不同，因為先進帝國主義與其殖民地間的貿易遠不如日本的多。<sup>13</sup>然而我們也可據此推論，日本帝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對待

<sup>9</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國際貿易導報》，卷8號10（1936年10月），頁73。

<sup>10</sup> 畢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年12月17日，第14版。

<sup>11</sup> 三菱經濟研究所編，〈東洋及南洋諸國の國際貿易と日本の地位〉（東京：三菱經濟研究所，昭和8年11月），頁6。

<sup>12</sup> 堀和生，〈植民地帝國日本の經濟構造——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號462(2001)，頁29；杉原薰，〈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收入氏著，〈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頁104；畢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年12月17日，第14版。

<sup>13</sup> 堀和生，〈植民地帝國日本の經濟構造〉，頁29。

亞洲貿易圈內非殖民地國家上，可能也存在某些差異，從而造就了日本在亞洲地區貿易快速擴張的局面。日本為逃避高額關稅，刻意減少直接貿易，而採取大量直接投資及向中國走私的措施，正是日本經濟勢力在亞洲快速擴張所表現的特徵之一。固然，日本對中國貿易總值，自 1932 年起即趨下滑，<sup>14</sup>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一般認為是中國抵貨運動及較高的關稅所致。然而中國海關貿易統計實際上不能表現日本的全部輸出。我們不能忽略，自從 1932 年 5 月中國抵貨運動消沉以來，日貨被課以高額關稅遠過於中國國貨，仍能克服，並且還能與英屬印度的紡織業競爭，是由於日貨為逃避高額關稅採取大量的向中國走私，及直接在華投資等迴避直接貿易的措施所致。<sup>15</sup>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就對華進行走私，最初在華北的走私貨品主要是白銀，僅 1934 年最末幾個星期，即有價值 2,000 萬元的白銀走私出口；1935 年一年之內，白銀走私出口估計在 1 億 5,000 萬元至 2 億 3,000 萬元之間。其後，日本轉而走私進口人造絲、砂糖、捲煙紙一類稅率較高的貨物。1935 年，經北寧路（即由東北）運往天津的走私商品，合計價值 1,405 萬金單位，為 3,165 萬銀元。<sup>16</sup>日本企圖擴張貿易所採取的另一種迴避直接貿易的方法是直接投資。基於確保日本戰略與經濟資源，<sup>17</sup>日本較其他列強更為重視直接投資。其在華投資額在 1930 年代之前即已迅速增長，而 1931 年後，其在關內實質投資額亦不可忽視。<sup>18</sup>據日本東亞研究所 1936 年末的統計，日本在關內的經濟投資 99,347.8 萬日圓，其中包括直接事業投資 94,550.4 萬日圓，合辦事業投

<sup>14</sup> 對日貿易的總體形勢在 1930 年代初期，對中國較為有利，中國對日貿易皆為出超，計 1931 年出超 1,200 餘萬元，1932 年出超 840 餘萬元，至 1933 年、1934 年兩年對日貿易始完全轉為入超，其入超額 1933 年為 3,650 萬元，1934 年為 4,270 萬元，1935 年為 5,916 萬餘元。年年入超皆呈上升之勢。觀之 1930 年代初期中日貿易，入口皆見增加，而出口逐漸呈現萎縮，結果入超數增。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二十四年第三季、第四季貿易報告》（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6），頁 111-113。

<sup>15</sup> 畢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 年 12 月 17 日，第 14 版。

<sup>16</sup> 鄭會欣，〈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3 年第 4 期，頁 93。

<sup>17</sup> 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 1-3。

<sup>18</sup>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8), p. 55.

資 3,936 萬日圓，和其他投資 861.2 萬日圓；以及借款投資 95,274 萬日圓，<sup>19</sup>其在華投資總額及增長速度已在各國間居於獨霸的地位。<sup>20</sup>至於日人在南洋之企業投資亦頗為積極，合計為 1 萬萬日圓左右，大部份均為栽培業。栽培業以外，日人經營礦業，包括鐵、錳等，開始係由臺灣銀行通融 60 萬元，後因錳鐵為國防必需原料，復受日本預金部 200 萬日圓以上之通融。<sup>21</sup>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地區經濟開發，促使資源及人力轉為日方所用，是日本快速擴展亞洲市場的重要助力，中國在這些相關領域相對顯得弱勢。

日本在亞洲地區市場快速擴張，必然面對其他集團經濟的衝擊。各集團國家為求將國內過剩商品傾銷到國際市場，紛紛貶低幣值，降低匯價。因此日本輸出猛進所表現的第二種特徵，即係導源於 1931 年 12 月廢止金本位後日幣外匯疲跌的動力上。外匯降低既影響輸出物價，在輸入貿易上也有其必然作用。輸出入貿易之間因而發生兩種物價的差額，此一差額且隨著外匯降低的程度而增大，隨著輸出貿易的增長，而愈形增加。日本自 1932 至 1935 年逐年輸出物價指數(1930=100)為 104-114-122-124，而同期間輸入物價指數之變化，則為 117-151-169-175。<sup>22</sup>與同時期其他國家比較，日本輸出物價下跌幅度之大，確實十分醒目。1932 年，美國的輸出平均價格指數（以 1927 年為 100）跌落為 59.3，英國跌落為 55.8，法國跌為 64，德國跌為 68.8，日本則獨特地猛跌為 37.8。<sup>23</sup>此一情勢的形成，也是由於日幣相對於英、美、華各國的幣值，皆處於大幅跌落的狀態。英美的外匯指數（平價為 100），1931

<sup>19</sup> 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二十二年第三季、第四季貿易報告》（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4），頁 91。

<sup>20</sup> 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頁 15。

<sup>21</sup> 塗琳，〈日本南進政策現階段之透視〉，《南洋研究》，卷 5 期 5（1935 年 12 月），頁 15。

<sup>22</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頁 79。

<sup>23</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頁 71。此處未能尋得中國輸出物價指數，試以上海躉售物價做為觀察指標，章乃器嘗指出：「1931 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後，倫敦銀價開始上漲，同時間上海物價由 1931 年之 126.7（1926 年為基準），下降到 1932 年之 114.4。1933 年以後紐約銀價也開始高漲，中國物價更由 1932 年 112.4，下降到 1933 年之 103.8，以至 1934 年之 97.1。」以上資料見：章乃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上海：生活書店，1936），頁 214-215。但無論如何，中國的物價水準比其他國家高出許多。



年降為 98.6，1932 年降為 65.9，1935 年降為 50.8；日圓外匯指數，1931 年為 126.9，1933 年降為 80.9，1934 年降為 64.4，1935 年降為 60.4。<sup>24</sup>以 1931 年和 1934 年比較，日幣對美匯價低落了 37%，對英匯價跌落了 48%，對華匯市卻低落了 150% 上下。<sup>25</sup>正由於日本匯兌以對華跌落得最厲害，日貨價格大幅下跌，其貿易推進最快的也是中國。<sup>26</sup>另一方面，由於日貨相對於國貨及歐美商品更趨低廉，日貨得以在南洋廣闢銷路，也導致國貨推銷南洋的不利。

日本工業化主導了亞洲區內的貿易，使 1930 年代亞洲區內的國際貿易走向工業型貿易主導的局面，<sup>27</sup>而亞洲各國之間發展的差距，則為日本製造了有利競爭的條件。日本在亞洲快速擴張所表現的第三種特徵，即以犧牲工資消費（wage goods，指依賴工資收入的消費）部門為代價，而對生產投資部門和出口部門「傾斜」的發展。<sup>28</sup>1930 年代，日本利用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作為佔領出口市場的跳板，正邁向以重化學工業為中心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從出口輕工業產品、進口重工業產品和原材料階段，開始發展至出口部份重工業產品、進口原材料階段。<sup>29</sup>同一時期的中國，雖然是以出口初級產品擴大國內市場為條件，增加進口固定資財、生產資料的重化學工業產品，進行以輕工業部門為中心的進口替代工業化，<sup>30</sup>然而因為進口方面，原料類在進口中的比重雖有上升，但製成品在進口總額中的比重仍維持在 40% 左右；出口方面，

<sup>24</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頁 70-71。

<sup>25</sup> 譚秉文，〈日匯跌落的原因和影響〉，《商業月報》，卷 15 號 2（1935 年 2 月），頁 3。

<sup>26</sup> 譚秉文，〈日匯跌落的原因和影響〉，頁 5。

<sup>27</sup> 杉原薰，〈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頁 97。

<sup>28</sup> Joseph Halevi and Bill Lucarelli, "Japan's Stagnationist Crises," *Monthly Review*, vol. 53, no. 9 (Feb. 2002), p. 25。1930 年代日本生產工具的價值，最少佔輸入總值之 69.7%（1930 年），最高佔 80.5%（1935 年），而消費資料的輸出價額所佔百分比都在 95% 以上。這表示以消費資料為主的輸出品產業及輸出貿易在日本整個生產上的重要地位，此並構成日本經濟復甦的動力。

<sup>29</sup> 中村哲著，陳應年等譯，《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83；約翰·伊特韋爾(John Eatwell)、默里·米爾蓋特(Murray Milgate)、彼得·紐曼(Peter K. Newman)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0），頁 795。日本的情況說明，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型增長之間的分歧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對亞洲或世界市場的擴展，仍是由國內市場帶動。

<sup>30</sup> 中村哲著，陳應年等譯，《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檢討》，頁 83。

原料的比重仍有所增加，製成品的比重因國內消費增加有所下降。<sup>31</sup>進口貿易的狀況比出口貿易更為清楚地顯示中國工業化的緩慢進展。<sup>32</sup>就東南亞各國而言，初級產品出口仍為其經濟發展的主力。1930年代亞洲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所表現出的進出口貿易結構，為亞洲各國之間貿易互補有無奠定了基礎，更為日本擴大出口提供了有利條件。

事實上，1929年後日本在亞洲貿易躍進期間，日本貿易的平衡發生顯著變化。1932年及1933年入超非常少，表現一方面輸出大量增加，同時輸入則相對低微。若以1928年的數字為基準，則至1935年，輸入增為112.6，輸出則增為125.7。<sup>33</sup>日本貿易入超的減少乃至於出現貿易順差，也影響國際收支的變動。日本自1929年起，即從資本輸入國變為資本淨輸出國，<sup>34</sup>國際收支且自1932年起由負轉正，<sup>35</sup>是全世界最早脫離經濟大恐慌陰影的國家。然而日本在亞洲貿易躍進的期間，1932年以後華僑產業卻面臨崩潰，華僑匯款急劇縮減。<sup>36</sup>由於華僑匯款是中國彌補國際收支的重要手段，中國國際收支頓失平衡之所依，開始出現嚴重逆差。<sup>37</sup>中國經濟隨之陷入恐慌蕭條的境地，與

<sup>31</sup> Yu-Kwei Cheng,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 D. C., 1956); 中譯本：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史實的綜合分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頁44-47。

<sup>32</sup> 1930年代中國也正進行擴大出口的發展政策。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陳公博曾主張：「我們應該獎勵輸出，而不是要防止輸入。」他呼籲以擴大輸出的方法平衡貿易收支。見陳公博，《四年從政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232-233。又，為了擴大輸出，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曾組團至南洋實地調查，並留下紀錄，即《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久保亨，〈國民政府的輸出促進政策と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一九三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輸出志向工業化の摸索〉，《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號103(1987)，頁81-113。

<sup>33</sup> 1930年代初期日本與多國進行貿易談判，限制日本傾銷，但在1935年前效果並不明顯，特別是日本的棉紡織品，仍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對東南亞的進口。見杉山伸也，〈日本の綿製品輸出と貿易摩擦〉，收入杉山伸也等編，《戰間期東南アジアの經濟摩擦——日本南進とアジア・歐米》（東京：同文館出版株式會社，平成2年），頁96-97。

<sup>34</sup> 畢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年12月17日，第14版。

<sup>35</sup> 伊藤正直，〈對外經濟關係〉，社會經濟史學會編，《一九三〇年代の日本經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頁79。

<sup>36</sup> 根岸佶，《華僑襟記》（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17年），頁157。

<sup>37</sup> 根岸佶，《華僑襟記》，頁151-155；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頁111-115。

日本的經濟情勢出現了反向的發展。由於日本在亞洲的快速擴張約起始於1930年，而中國的經濟蕭條約於1935年終止，<sup>38</sup>本文因擬探討這段期間，日本在亞洲經濟擴張對中國經濟的衝擊。

### 三、地域經濟的推移與中國商品市場的變動

1930年代，中國對外貿易之重要對手國為英美日三國。<sup>39</sup>由於世界經濟恐慌日益加重，各國競謀國外市場之發展，中國的國內市場遂成三國貿易爭奪的地域。<sup>40</sup>如美國實施白銀政策，日本倡行經濟提攜，英國遣其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Leith-Ross)來華，在在證明各國擴張中國市場的企圖。觀察各國輸華貿易數字，可知1930年代以來美國輸華貿易十分發達，躍居第一位。美國輸華貿易總值自1931至1935年分別佔全部進口總值之22.18%、25.43%、21.86%、26.35%、19.00%，尤其是1934年，達於對華貿易的巔峰狀態。美中貿易及相對地位的上升，部份原因是由於當時中國普遍瀰漫的排日氣氛，造成日貨需求下跌，對日貨的購買力轉為對美貿易的強烈需求。其次，1930年代中國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對美國的機械、船舶、車輛、石油需求甚殷，造就中美貿易繁榮鼎盛的局面。唯美國對華輸入額佔總額百分比由1931年之22.18%下降至1935年之19.00%，<sup>41</sup>亦可知美貨在華貿易總額有滑落之

<sup>38</sup> 久保亨，〈幣制改革以降の中國經濟〉，收入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頁96-108。

<sup>39</sup> 1931-1935年間，英美日三國與中國之對外貿易關係非常密切，參考：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的全貌》（東京：日本國際協會，昭和15年），頁71-72；米谷榮一，《近世支那外國貿易史》（東京：生活社，昭和14年），頁299-300。1931年至1934年部份可看：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錢業月報》，卷15號11（1935年11月），頁27。1935年部份可參考：長野朗，《支那を舞臺の列強資本戰》，收入氏著，《現代支那全集》（東京：阪上書院，昭和13年），卷5，頁340-341。以上數本書籍所引數字略有出入，但所論貿易趨勢大體相同。

<sup>40</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壞と日本》（東京：千倉書房，昭和11年），頁377。又周默秋，《華北五省經濟與英日》（上海：現代國際社，1936），頁244，亦有對英日在華北激烈競爭的分析。

<sup>41</sup> 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的全貌》，頁71-74。

勢。根據上列貿易統計數字，英貨進口總值在 1931 年約佔 8.28%，1932 年後，由於九一八事變、抵制日貨運動的影響，英貨進口地位略有起色，自該年至 1934 年，進口總值分別佔 11.20%、11.33%、12.09%，1935 年略趨下滑，該年佔全部進口總值 10.67%。<sup>42</sup>

與英美輸華貿易滑落相對照的是日本經濟勢力的躍進，此可就日本與列強對中國貿易總額加以比較觀察。固然，自 1930 年後日本對華輸入呈萎縮之勢，從 1931 年佔中國輸入總額的 20.04%，下跌至 1932 年的 14.2%、1933 年的 9.9%，1934 年微幅爬升至 12.5%，1935 年則為 15.6%。<sup>43</sup>從日本輸入萎縮的同時，反映出西方國家輸入的相對增加：從 1929 年至 1935 年中國總輸入價額指數由 100 減為 93，其次，主要的國家如美國，由 100 減為 76，英國由 100 減為 50，而日本則較甚地減為 46。但，這個比較是不能把日本在此時期輸出貿易對於中國本部的新動向表示出來的。我們可以注意到，1933 年以後的新動向。1933 年日本商品輸入佔中國本部全輸入價額之 11.4%，而 1935 年則增為 15.0%，同時期，美國由 22.2%減為 18.9%，英國則自 16.7%益減為 10.5%。論其絕對額，則英國由 1933 年之 15,400 萬元減為 1935 年之 9,800 萬元；同時期，美國由 29,700 萬元減為 17,500 萬元，而日本則由 13,200 萬元增為 14,000 萬元。<sup>44</sup>

這種情形同樣顯現於輸入商品之部類中。綜觀三國在中國商品市場上的競爭形勢，英美兩國商品部類之衝突較小，日本與美，尤其是英國商品之衝突甚深，也說明了日本商品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正在攀升。<sup>45</sup>首先就英美二國輸華貿易的商品結構加以觀察，美國重要輸華貨物，大別之，可分原料品，

<sup>42</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72-373；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の全貌》，頁 70-71。

<sup>43</sup> 米谷榮一，《近世支那外國貿易史》，頁 300-301，有關日本對華輸入佔中國輸入總額比率，主要係根據該書頁 301 所引國際聯盟數字，缺漏的年份則參考頁 300 的數字。

<sup>44</sup> 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の全貌》，頁 71。

<sup>45</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77；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頁 28。

如棉花、穀類及其製粉（小麥及麵粉）、煤油等，及重工業品如汽車、飛機、機械等，<sup>46</sup>係以運輸工具為中心的生產財與原料品的輸入為主。英國以毛皮為其輸入我國之重要原料品；輕工業品則為棉織物及毛織物等，重工業品多為鋼鐵等物，<sup>47</sup>係以輕工業品為中心之消費貨物及生產工具的輸入為主。<sup>48</sup>即使單就 1934 年而言，且不論石油、煙草等美國特有商品，美國其他居於優勢的商品，如棉花、穀類、飛機、汽車，也佔了美國對華輸入總額的 27%；就英國而言，其居於優勢的金屬、機械及器具，也佔了該國進口總額約五成。<sup>49</sup>兩國進口商品有所區隔，可以說，英美在華商品市場上之利害衝突較輕。

日本與英國消費貨物之對華輸出，成對立局面。這是由於美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原料品佔了一半以上，而日英輸華的商品，大部份是製造品之故。<sup>50</sup>日本與美國商品之間並非沒有利害之爭。日本早年對華輸入品中，原料亦佔重要地位，如麵粉一項，日本在 1931 年對華輸入佔輸入總額的 34.9%，1932 年下降至 12.9%，美國麵粉對華輸入反於此時壓倒性地提升到了 63%，使日本麵粉進口幾近絕跡。<sup>51</sup>此外，由於石油、棉花、小麥、煙草等原料，幾乎佔了美國對華進口總值的 56%，其中棉麥二項，由於廉價傾銷及棉麥借款等暫時性原因更輸入不少，美國商品在華原料市場之供給上因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sup>52</sup>日本則不然。1930 年代日本產業已由製造半成品之生絲、棉紗等，進入以半成品製成全製品之境地，此類商品且佔其進口總額的 47%（1933 年）

<sup>46</sup> 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頁 28；方嘉禾，〈最近日英美三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之地位觀〉，《國際貿易導報》，卷 8 號 4（1936 年 4 月），頁 97。

<sup>47</sup> 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頁 28。

<sup>48</sup> 方嘉禾，〈最近日英美三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之地位觀〉，頁 97。

<sup>49</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77。細見健三認為，米國居於優勢的產品佔 56%（1933 年）及 50%（1934 年）；英國居於優勢的產品佔 47%（1933 年）及 43%（1934 年），見細見健三著，〈北支那の外國貿易と列國の商勢〉（東京：學藝社，昭和 12 年），頁 56。

<sup>50</sup> 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76。

<sup>51</sup> 〈日美在中國市場之競爭〉，《西北文化日報》，1934 年 9 月 8 日，第 2 版。

<sup>52</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77-381；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上），頁 78-79。

及 41% (1934 年)。<sup>53</sup>就當時之國際經濟立場言，1930 年代之前，日本的輸出市場大半為對製成品之工業原料有需求的先進國，此後則擴及消費直接製成品之市場，以為其工業生產品之尾閭。此種轉變，最易招致之結果，是中國方始萌芽之工業將受挫折，以及日本之貿易與各先進工業國家必然發生衝突。受後者之情勢打擊最深者，莫如英國。英國之輸出物以紡織品為主，<sup>54</sup>日本輸入中國之商品亦以紡織品為主，且日本更握有中國紡織市場之支配權。<sup>55</sup>其次，毛織品、金屬、金屬製品、機械器具等，皆與日本立於競爭的地位。<sup>56</sup>激烈競爭的結果，棉布一項，英國進口由 1933 年的 3,600 餘萬元，減至 1934 年的 1,900 萬餘元，日本進口亦有趨減之勢，然而日本棉布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卻逐漸升高；<sup>57</sup>1933 至 1935 年三年間機械的進口，日貨由 670 萬元增為約 1,340 萬元，英貨則由 1,620 萬元減為約 1,480 萬元；鋼鐵的輸入，日貨由 640 萬元增為 1,100 萬元，英貨則由 2,700 萬元減為 1,600 萬元；化學製品，日貨由 660 萬元增為 830 多萬元，英貨則由 1,470 萬元減為 790 多萬元。<sup>58</sup>可以說明日貨在大部份產業市場的擴充上皆趨優勢。

中國本部的貿易區域，歷來分為華北、華南、華中三部份。1930 年代中國三大經濟圈對外貿易的比重，隨時間推移而有興衰消長的變化。1931 年，華中地區的貿易佔全國貿易的五成一分，華北及華南各佔一成四分。<sup>59</sup>九一八事變後，華中貿易的比重一時劇減，1932 年落至全國貿易總額的 57.9%，1933

<sup>53</sup> 細見健三，《北支那の外國貿易と列國の商勢》，頁 56。1930 年代日本出口商品之結構，可見松井清的討論，見松井清，〈日本經濟と南洋貿易〉，收入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編，《東亞貿易論》（京都：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昭和 17 年 3 月），冊 4，頁 18。

<sup>54</sup>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中日經濟提攜聲中日本貿易特徵研究〉，《中行月刊》，卷 10 號 3（1935 年 3 月），頁 6。

<sup>55</sup> 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頁 28。

<sup>56</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壞と日本》，頁 377。又，周默秋，《華北五省經濟與英日》，頁 244，亦有對英日在華北激烈競爭的分析。

<sup>57</sup> 《大公報》，1934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sup>58</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頁 84。

<sup>59</sup> 劉仰之，〈長江流域的對外貿易之鳥瞰〉，《中國經濟評論》（漢口），卷 1 號 9（1934 年 10 月），頁 75。高橋龜吉以為，1931 年華北對外貿易，佔中國對外貿易額的 13.6%，華中佔 69.8%，華南佔 16.6%。見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壞と日本》，頁 372-377。

年略有回升，該年華中對外貿易總額佔全國貿易總額 60.4%，1934 年再度攀升至 65.1%。華北對外貿易總額在九一八事變後則急劇增加，1932 年升至 17.4%，1933、1934 年略為下滑，對外貿易總值分別為 15.2%及 15.3%。華南對外貿易總值在九一八事變後也有短暫增加的現象。1932 年增至 24.7%，1933 年略微下滑至 24.4%，1934 年後則直線下降至 19.6%。<sup>60</sup>總括言之，儘管華中貿易在 1930 年代上半期顯見漲落起伏不定的現象，然而其在全國貿易中一直佔有壓倒性的優勢，華北貿易所佔比重漸趨增加，華南貿易則漸趨下降。

華中、特別是華北貿易所佔比重的增加，與列強之間經濟勢力的消長，特別是日本勢力的急劇增強，最為相關。在抵制日貨運動高漲的 1930 年代初期，日本對華貿易進口量在排日中心的上海一路下滑，從 1931 年的 14%，落至 1933 年的 6%。與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國趁機而起，其對上海的進口量從 1931 年的 11.2%，攀升至 1933 年的 13.7%。然而日本對華貿易漸居舉足輕重的地位後，其進口量下跌，使同期華中輸入貿易在全國貿易所佔比重同步趨於下滑，1931 年華中輸入貿易佔進口總額的 67.4%，1932 年、1933 年分別減至 55.5%、58.3%。<sup>61</sup>一二八淞滬戰後，日貨走避華北，1931 年日貨輸入華北佔日本對華進口總額的 36%，1932 至 1934 年所佔比重，大幅躍升至 58%、54%、48%。<sup>62</sup>同時期日貨輸入華北佔全國輸入貿易比重開始攀升，1931 年仍佔 12.3%，1932 年、1933 年則進至 16.4%、14.7%。1933 年後，抵制日貨運動雖趨於和緩，但由於滿洲國興起，華北貿易所佔比重仍居高不下，1934 年

<sup>60</sup> 前田健次著，漢文譯，〈長江流域對外貿易情勢〉，《中國經濟》，卷 3 期 9（1935 年 9 月），頁 1。又可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產業部編，《北支那經濟綜觀》（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 13 年），頁 523。

<sup>61</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87-388。

<sup>62</sup> 細見健三，《北支那の外國貿易と列國の商勢》，頁 118-119。堀和生也討論到對日貿易華北佔全國比重偏高的現象，但討論的年份與本文不同，可與本文互相參證。見堀和生，〈殖民地帝國日本の經濟構造〉，頁 34。又，〈所謂「開發華北產業」與今後華北貿易〉（二），《西北文化日報》，1935 年 8 月 7 日，第 2 版，曾指出不能忽視走私貿易在華北貿易所扮演重要角色。該文以為，如果將走私貿易考慮在內，則日本在華北貿易佔有絕對重要地位，且使華北貿易發生質的變化。該文譯自日本《東洋經濟新報》。

維持 14.9%的比重。同一時期，英國對華北的輸入額由 1933 年的 7.9%，降至 1934 年的 6.4%，日本之外其他列強在華北所佔地位也趨於下跌。至於列強角逐激烈的華中，特別是整體貿易比重居高不下的上海，日本貿易進口量的增加固然備受矚目，相反地，英國勢力日趨下跌，也是不爭的事實。這可以證明日本在華北地位屹立不搖，在華中地位漸趨鞏固，<sup>63</sup>使中國各地域別的貿易量變化，呈現重北輕南的現象，經濟重心趨向北移。

此一情勢順水推舟發展的結果，自然是在商品市場上「東貨」取代了「西貨」。事實上，中國的商品市場自民初以來，即是洋貨或舶來品充斥雜陳的局面。當時所稱「西貨」，即歐美各國的產品，因質料優良，價格雖頗昂貴，仍為愛慕新奇者所好。當時所稱「東貨」，即日貨，質料稍劣，價格亦廉。西貨價值昂貴，非一般民眾所能購買，日貨經濟實惠，接受性高。日本為工業國家，其經濟之充裕與否，咸賴商品市場之擴充；中國為農業國家，正為容納他國商品之良好市場，此一情勢潛藏了「東貨」在中國商品市場耀武揚威的可能性。<sup>64</sup>1930 年代以抵制日貨為共同訴求的國貨運動蓬勃發展，正說明了此一威脅性的存在。<sup>65</sup>

#### 四、新商路的開闢與銷售組織的演變

1930 年代左右，中國的主要交通聯繫工具仍倚仗水路航運系統。經濟勢力的擴張、貿易路線的開發，皆有賴水路交通新格局的出現。這可以說明日

<sup>63</sup>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87-388。

<sup>64</sup> 《漢口商業月刊》，卷 2 期 4(1935)，轉引自《湖北近代經濟貿易資料選輯》4（武漢：湖北省貿易志編輯室，1986），頁 24。

<sup>65</sup> 1930 年代發生了多次抵制日貨運動，可從報刊雜誌及日文的調查報告中看出。見黑松巖，〈支那のボイコットに就て〉，《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卷 40 號 618(昭和 10 年 3 月)，頁 140-141。大村得太郎，〈支那經濟界の検討〉，原件藏愛知大學霞山會館，編號 11067。同時，中國自發的許多國貨運動，目標也是以掃除日貨為主。見潘君祥主編，張今華副主編，全國政協文史辦等編，《中國近代國貨運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 31。



本的企業家或政府何以積極主張開闢中國的航權。<sup>66</sup>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之初，儘管日本在華航業一蹶不振，<sup>67</sup>致使多家日籍輪船公司的營運陷於停頓；然而1933年1月，華北停戰協定簽定，抵制日貨運動高潮漸退之後，日本政府在財力上大量支援，日籍輪船開始極力增購船隻，開闢新航線。<sup>68</sup>日本增闢上海至香港、福州、臺灣之航路，企圖進一步奪取長江以南各地航路。日商大阪商船、大連汽船公司並實行聯運計畫，致力加強華中各埠與華北天津、青島、營口、煙台、芝罘的定期航權，幾已掌握所有華北航權，<sup>69</sup>此並影響了渤海灣區航運體系的變化。

就華中地區而言，日人試圖積極利用長江流域漸漸形成之以武漢為中心的四通八達、大小結合的輪運系統，進一步發展自有航運系統，以建立其在華中的經濟優勢。1933年之後，以日清為主的日商輪船公司，一方面積極恢復滬漢線航班，維持長江中、下游橫向傳導運輸的暢通無阻，以便將漢口所具有長江流域最大農產品集散中心和機製產品分銷基地的功能，與沿海通商大埠上海轉接世界市場的功能相聯繫；另一方面，從漢口出發，駛往長江中上游的運輸路線也陸續開闢。<sup>70</sup>日清公司更透過日海軍的援助，自由登陸長江沿岸各埠。<sup>71</sup>日本以武漢在長江上下游東西傳導中可以發揮的作用，利用漢口航線為據點，發展其在長江沿岸各地之間的有機聯繫。漢口固然對長江流域各港建立了主從依賴的關係，然而它並不只是附庸於上海的內陸交通樞紐。為

<sup>66</sup> 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天津ニ於ケル日本輸入品ノ奧地流動狀況〉，天調72號（昭和10年7月30日，原件藏日本山口大學），第2章。

<sup>67</sup> 圓谷弘著，鄧達章譯，〈英日美三國的經濟爭霸戰〉，《中國經濟》，卷5期2（1937年5月），頁45，曾提到：1930年代初期，「日本對華航業竟激減了一半，英國勢力恢復，和中國受美人暗助而起的航行權收回運動，日本在華航業的前途，是何等慘淡啊！」

<sup>68</sup> 見〈日商謀復長江航業〉，《申報》，1933年6月3日，第11版；〈日本積極侵我航權〉，《申報》，1933年7月4日，第10版；〈日本對華航業新計劃〉，《申報》，1933年8月6日，第19版；〈日商謀復長江航業〉，《申報》，1933年6月14日，第10版；〈日商謀復川江航路〉，《申報》，1934年6月5日，第12版。

<sup>69</sup> 〈寧府幫助日商攫取在華經濟霸權〉，《福州人民日報》，1933年12月5日，第3版。

<sup>70</sup> 〈長江日輪圖全部復航〉，《時事新報》，1933年5月15日。

<sup>71</sup> 〈大可注意之日貨運往長江各地〉，《江西民國日報》，1932年7月2日，第5版；〈日人積極擴大長江方面海軍實力援助日商銷（消）滅抵貨運動〉，《時事新報》，1933年5月30日。

了使漢口超越原本以轉輸貿易為主的角色，從而日益與國際市場直接緊密聯繫，漢口還開闢了直航日本大阪、橫濱、神戶等港的國際航線。<sup>72</sup>儘管英國在長江流域航權的角逐上久居霸權地位，<sup>73</sup>但由於「日輪獨多」於漢口，<sup>74</sup>漢口顯然產生新的、以日本為主的、以國際市場為中心的新商貿路線與商品流通體系。

武漢此一情勢的發展，也反映上海充當華中地區商品總匯中心的角色，因武漢在水上交通方面獨具的優勢而發生了改變。早先的現象可以發現漢口離不開上海，因為「它總是跟著上海，而不是跟倫敦進行貿易，而且所有漢口的外國洋行和大多數的華商行號都是上海總行的分行。」<sup>75</sup>1930年代初期，因抵制日貨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日貨難以從上海進口，上海市場有轉移漢口之勢。<sup>76</sup>1932年前，日貨傾銷的地點在上海、廣州、天津等通商大埠，日貨的進口在上海起卸者多。但1932年後，日貨開始向中國內地推進，傾銷地點轉向長江上游。「日貨運漢漸多」，<sup>77</sup>日貨在漢口起卸者也漸多。<sup>78</sup>如日糖多由漢口進口，海產亦有移向漢口的趨勢。<sup>79</sup>最後，日本棉紗竟也「獨佔漢口

<sup>72</sup> 〈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第貳拾參年度後半期事業報告書〉，《經濟月報》，昭和5年號42(1930)，頁9。

<sup>73</sup> 圓谷弘著，鄧達章譯，〈英日美三國的經濟爭霸戰〉，頁46。

<sup>74</sup> 〈長江日輪圖全部復航〉，《時事新報》，1933年5月15日；〈大可注意之日貨運往長江各地〉，《江西民國日報》，1932年7月2日，第5版；〈日人積極擴大長江方面海軍實力援助日商銷（消）滅抵貨運動〉，《時事新報》，1933年5月30日。

<sup>75</sup>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3), pp. 98-99.

<sup>76</sup> 〈漢口に於ける輸入綿布の推移と相場〉，《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號307（昭和7年12月），頁32。

<sup>77</sup> 〈日貨運漢漸多，長江日輪復航〉，《申報》，1933年6月1日，第11版。

<sup>78</sup> 〈漢口に於ける輸入綿布の推移と相場〉，頁31-32；〈漢口向日貨增加〉，《海外經濟事情》，第6年號3（昭和8年），頁52。

<sup>79</sup> 武育宣，〈九一八後之中日貿易〉，《中國經濟》，卷3期7（1935年7月），頁11-12。又見〈過去二十年間的漢口貿易の大勢與昭和七年度の漢口對外、對日貿易〉，《滿鐵調查月報》，卷13號4（昭和8年4月），頁221。鄭友揆亦提及，1932年後，海產、糖類有由漢口而非上海進口之勢，見鄭友揆，〈九一八後二年我國進口日貨分析〉，《社會科學雜誌》，卷5期1(1934)，頁7。

市場」。<sup>80</sup>1933年後，日商積極開發漢口物資供應上的優勢，竟將輸入之大批商品，降價傾銷，並利用不肖商人改換商標，冒充國貨，<sup>81</sup>以致漢口市面日貨「疋頭、海貨、文具紙張均充斥」，<sup>82</sup>且「漢市所有百貨商店、匹頭店，幾成日貨代售所」。<sup>83</sup>可見憑藉漢口所具通商大埠的轉運機能，整個長江中上游均已為日貨賴以依託的腹地市場。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滿洲後，華北（山東半島）與東北（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等黃海、渤海灣區，由於日貨進出頻繁，商品流量增大，形成獨自的地域經貿圈，提升了大連轉口港的地位，也有擺脫上海商貿網絡之勢。九一八事變之前，大連以日本產品市場居首位，九一八之後，以東北產品市場居首位，但大連經濟既已定位為外向型經濟，無論是以東北原料加工製成的商品運往日本，或再銷往東北，均以滿足日本帝國內部所需為最終目的。<sup>84</sup>由於日本產品經陸路由朝鮮半島向東北地區販售，部份朝鮮的大連幫因而取代上海幫成為最活躍的商幫。<sup>85</sup>另一方面，來自日本帝國（含朝鮮）的商品也多向上海以北的渤海灣、黃海沿岸各港集中，1933年滿洲國成立後，大連對日航線漸次開啓，其對南中國海及渤海灣各港的航線逐漸增加，以致鄰近營口港的地位下滑。這是因為渤海灣沿岸原有兩個航運中心，以營口為中心的渤海沿岸航路，係滿洲國及中國航運公司經營的航路，幾僅行駛天津、龍口等港之間；以大連為中心的渤海灣航路，幾為日籍航業的勢力範圍，行駛港口包括大阪、神戶、天津、青島、上海、芝罘、威海衛、仁川、新義州等，不只航運路線長，且多定期航線，原登州、龍口、天津與營口之間繁盛的貿易，顯然漸被大連所奪。<sup>86</sup>隨著渤海灣區貿易量大幅揚升，中國北方港口

<sup>80</sup> 〈日本棉紗獨佔漢口市場〉，《申報》，1934年4月9日，第8版。

<sup>81</sup> 〈漢口商輸入大批貨品〉，《申報》，1933年5月11日，第7版。

<sup>82</sup> 〈漢市日貨傾銷〉，《申報》，1933年7月15日，第11版。

<sup>83</sup> 〈漢中日貨充斥〉，《西京日報》，1934年8月30日，第6版。

<sup>84</sup> 沈毅，《近代大連城市經濟研究》（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頁98。

<sup>85</sup> 駐釜山領事館，〈釜山華商出口貿易近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7號7（1934年7月），頁43。

<sup>86</sup> 三村哲雄，〈遼西及北支經濟事情〉，《海外經濟事情》，第9年號16（昭和11年），頁189-191。

的相對重要性凌駕南方大港之上。1932、1933年，中國最大對外貿易港口依次是上海、天津、廣州、青島，然而1934年青島的貿易量終於超越廣州，躍升為中國第三大港口。<sup>87</sup>

由於注重水運系統的廉價運輸功能，日商在華中、華北發展以沿海城市為中心的市場配銷網。為了在沿海城市與內地之間形成土洋貨購銷網，他們運用口岸「行棧」為核心，<sup>88</sup>這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為外商服務的商品流通網。日商輸入業者的配貨組織與其他國家對華輸出製造業者配貨組織不同之處，在於日商輸入業者，不論是華商問屋（批發商），或是代理商的華北本店，可以成功地利用行棧資本，在許多集散市場和專業市場，開設各式號莊，經營各類土洋貨交易。這些號莊也操控著當地的土洋貨進出口。日商輸入業者的配貨組織，結合了沿海城市行棧勢力，促使沿海城市與內地之間形成一個土洋貨購銷網。經濟蕭條以前，日本輸華的產業不像歐美各國洋行之設立買辦，以此類中間商人從事在華交易，他們多排除中間商人，在各地設立支店，以直接接觸消費者來滿足最終消費的需求。然而此種遍布各地的細密配給網，由於經不起經濟蕭條市場緊縮的打擊，紛傳倒閉。如代理日商東洋紡織的信易洋行，即是一例。<sup>89</sup>隨後，日本此種由產業輸出國家製造業者成立的組織發生變化，轉為委託販賣給在華華商，由華商至各地銷售。<sup>90</sup>這可以說明有關日本商品的輸入，華商所扮演輸入商的角色，何以相對於日本商人有反比例增加的現象。<sup>91</sup>日益增加的華商，正好滿足城市中中國民族紡織企業的需求。

至於農村中非進口商品流通區的土貨配銷系統，則是走私貿易猖狂泛濫之處。由於都市中官方取締走私貿易，走私商品多流入農村，低廉的走私原

<sup>87</sup> 三村哲雄，〈遼西及北支經濟事情〉，頁179。

<sup>88</sup> 行棧即「貿易貨棧」，係指溝通買賣雙方的居間性、服務性商業企業。見郭今吾主編，程雨村副主編，〈經濟大辭典·商業經濟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頁79-80。

<sup>89</sup> 枝村榮，〈天津輸入品市の直系配給組織〉，《滿鐵調查月報》，卷15號2（昭和10年2月），頁2。

<sup>90</sup> 枝村榮，〈天津輸入品市の直系配給組織〉，頁3-4。

<sup>91</sup> 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天津ニ於ケル日本輸入品ノ奧地流動狀況〉，天調72號，第1章。

料乃為農民利用，用以生產土布。另一方面，在走私商品流入區，成本低廉、價格便宜的手工織布業，又成為城市中不能利用走私品為原料的民族紡織企業之競爭對手。城市中民族紡織企業使用的，正是日本正規商人的原料或半製品，價格較高，正規商人不敵走私貿易，而利用走私原料的農村手工業則大發利市，對城市的民族紡織企業構成極大威脅。城市中，日本在華紡操縱市場，華廠歇業停工不知凡幾；農村中，日貨走私猖狂，華北各紗廠也遭遇嚴重打擊。<sup>92</sup>這是因為利用走私品的農村手工業雖然獲利甚豐，然而同時也造成農村中原料和半製品生產者的生存威脅。走私貿易是日本軍部發動的，顯然是為了達成其「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的目的，因為走私貿易可能不只摧毀了中國的民族企業，也使城鄉之間的產業分工無以為繼，危及中國產業發展。無論蜂擁而來的是日本的正規商品或走私商品，都可能讓中國的生產停留在農業階段。<sup>93</sup>

## 五、華僑經濟的蕭條與亞洲國際分工秩序的變化

1930年代經濟危機，嚴重地破壞了世界經濟體系，國際貿易急劇萎縮，造成東南亞市場蕭條。東南亞各地人民購買力大為降低，商品庫存激增，價格下跌，資金週轉不靈。另一方面，經濟危機又導致日本商品的激烈競爭，使華僑商業更陷入困境。日商對東南亞市場的爭奪，始自第一次大戰期間。第一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向南洋擴張的勢力越來越猛。日本利用其國內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大肆向東南亞傾銷日貨，以致當其他西方國家與東南亞貿易日呈萎縮之時，日本與東南亞的貿易卻大幅度增長，使英、荷各國群相驚異。

<sup>92</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茂新、福新、申新系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冊上，頁449-451。

<sup>93</sup> 今井駿強調日本對華北走私對農村手工業有利，以及對城市民族紡織業不利的一面，見今井駿，〈いわゆる「冀東密輸」についての——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史研究の視角から〉，《歷史學研究》，號438（1976年11月），頁16-17。筆者則認為走私對農村經濟有其不利之處，此並影響了城鄉關係的正向發展，與今井駿觀點不同。

以日本商品在東南亞的主要市場——蘭領東印度為例，日貨在其進口商品中所佔比例上升極快，1925 至 1929 年為 10.2%，1931 年為 16%，1932 年為 21.2%，1933、1934 年又大步躍升至 31%、31.9%。<sup>94</sup>再以日貨在英屬馬來亞半島傾銷的情形而論，1929 年日貨在進口商品中所佔比例為 2.6%，1932 年迅速上升至 4.5%，到了 1933 年更露出驚人的成長，佔進口商品市場比例的 7.4%。<sup>95</sup>日本在暹羅輸入上也顯露出驚人的進步，1929 至 1930 年佔 8.1%，1933 至 1934 年則躍增為 15.8%。<sup>96</sup>南洋貿易中日本所佔地位與各國變動相反的結果，荷蘭在蘭領印度所佔比率一路下滑，1929 年佔了 19.6%，1932 年為 15.8%，1933 年 12.4%，1934 年為 13.0%。英國在蘭領印度所佔比率則由 1929 年的 10.8%，下降至 1934 年的 9.9%。<sup>97</sup>與暹羅關係密切的英國，對暹羅的輸出，由 1929 至 1930 年的 16.5%，降至 1933 至 1934 年的 11.7%。荷蘭對暹羅的輸出，1929 至 1930 年佔 2.5%，1933 至 1934 年則佔 1.6%。英國對英領馬來的輸出也呈下滑之勢，1929 年佔了 16.5%，1933 年為 14.2%。<sup>98</sup>

日貨在東南亞的擴張，排擠了華僑的經營，使華僑在經濟危機中的處境更形困難。不少從事對外貿易仲介行業的華商縮小經營規模，有相當數量的華商破產倒閉。1929 年，馬來亞的進出口總額為 183,000 萬叻幣，到 1932 年減少到 74,500 萬叻幣，1933 年稍有回升，也只達到 76,000 萬叻幣，<sup>99</sup>分別相當於 1929 年的 40%和 41%，貿易額明顯減少。即使是馬來亞的華僑仲介商能保持對外貿易的比例，也只是在不到過去貿易額二分之一的情況下才得以維持。實際上，這一時期大批的華僑經營者難以維持而倒閉的，1931 年僅新加坡破產案就有 250 家，其中還有資金在百萬元以上的。又據 1931 年統計，馬

<sup>94</sup> 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出版年不詳），頁 244；周建言譯，〈日本的南洋政策〉，《中國經濟》，卷 5 期 1（1937 年 1 月），頁 120。

<sup>95</sup> 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頁 173。

<sup>96</sup> 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頁 109。

<sup>97</sup> 周建言譯，〈日本的南洋政策〉，頁 120。

<sup>98</sup> 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頁 109-110、173。

<sup>99</sup>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東京：巖松堂書店，昭和 15 年），頁 169。

來聯邦的破產者中，華僑佔 55%。<sup>100</sup>蘭領東印度的進出口額在 1929 年時為 2,495 百萬盾，1933 年劇減為 786 百萬盾，不到 1929 年的三分之一。以華僑經營的大宗進出口商品為例，1929 年的出口額為 104 百萬盾，1931 年只有 59 百萬盾。<sup>101</sup>蘭領東印度當局對華僑經營的中國進口商品實行多項限制，日貨又乘隙廉價傾銷，華僑經營者越來越陷入困境，破產者也與日俱增，僅佔蘭領東印度人口總數 2% 的華僑，經濟危機期間的破產數卻佔全部破產數的 50% 左右。<sup>102</sup>1927 至 1928 年暹羅的進出口總額為 477,349 (千銖)，1933 至 1934 年則減少到 237,042 (千銖)，後者為前者的 49.7%。<sup>103</sup>經濟危機前，華僑經營額約佔進出口總額的 52%；經濟危機中，減少到只佔約 30%。<sup>104</sup>此並影響華僑與日商銷售據點的消長。爪哇一地，1932 年日僑開設的商店達 200 餘家，1933 年增至 300 餘家，<sup>105</sup>至 1934 年已有 500 多家。<sup>106</sup>其他重要都市，自印尼之巴達維亞之 20 餘所開始，萬隆之巴煞巫拉，原有華僑 40 餘家，1930 年代初已「概由日商包辦」。<sup>107</sup>其他如暹羅盤谷(今曼谷)及附近城鎮，日本商店各有 10 餘所，即向來為華僑根據地之斯馬爾亦有 10 餘所。日貨發展急激，可以想見。<sup>108</sup>

日本商品大量向外傾銷，除影響華僑經手之南洋產品的銷售外，也影響

<sup>100</sup> 郭梁，〈1929~33 世界經濟危機對東南亞華僑經濟的影響〉，《南洋問題研究》，1989 年第 1 期，頁 4；《南洋情報》，卷 1 期 5(1933)，頁 184。

<sup>101</sup>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頁 293-294。

<sup>102</sup> 《時事月報》，卷 15 期 1(1936)，頁 18。

<sup>103</sup> 郭梁，〈1929~33 世界經濟危機對東南亞華僑經濟的影響〉，頁 4；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頁 328。

<sup>104</sup>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頁 330。

<sup>105</sup> 《海外月刊》，期 24 (出版年月不詳)，頁 13。

<sup>106</sup> 姚忠華，〈南洋華僑的過去狀況及其衰微之原因〉，《香港華僑總會月刊》，卷 1 期 6(1933)，頁 (甲) 62。

<sup>107</sup> 鄭季楷，〈南洋僑胞之厄運及其出處〉，《僑務月報》，卷 2 期 2(1933)，頁 19。又，國民政府國際貿易局長何炳賢曾指出：「荷印有一百三十多萬華僑，但國貨銷數不到百分之二、三，日人祇有五、六千，日貨則幾佔全市場。」見〈何炳賢談華僑南洋貿易〉，《申報》，1934 年 2 月 19 日，第 12 版。

<sup>108</sup> 〈日積極侵奪南洋華僑地位〉，《時事新報》，1933 年 3 月 20 日，第 4 版；又見姚忠華，〈南洋華僑的過去狀況及其衰微之原因〉，頁 (甲) 62-63。

國貨在南洋的販售，以致中國對南洋貿易，除對菲律賓及英屬馬來亞有時出超外，餘均入超甚鉅，造成出口不足以抵償進口的局面。<sup>109</sup>南洋對中國的輸入，食料佔大部份，尤以米類為多，米糧的輸入平均佔南洋對中國輸入 35% 以上。其次是礦產，以石油為大宗，約佔中國石油進口 35% 以上。第三是糖類，1930 年代以來，中國糖業基礎蕩然無存，洋糖乃進而獨佔中國市場。餘若海產、金屬、樹膠等貿易，每年亦有相當數量。至於中國對南洋輸出的物品，類皆零星散漫，不若輸入方面有千萬金單位以上的大宗。在各項輸出品中，以棉貨類的數目較大，但為數亦不過 1,000 萬金單位之譜。<sup>110</sup>1930 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和中國貿易入超都已漸減少，只有中國和南洋的貿易，在全世界貿易極度萎縮期中，在中國入超漸趨減少的時候，反而突飛猛進。1933 年這類入超額，竟佔中國入超總額的 32%，超過任何兩個國家對中國的入超。<sup>111</sup>

1930 年代以來，日本擴大輸出，尋求通過亞洲的區域市場，建立以出口為導向的擴張策略，重新整編亞洲的進出口市場，使日本取代中國，成為區域內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是中國對東南亞貿易收支趨向不利的重要原因。儘管日本以追趕發達國家為目標的發展模式，1930 年代已到了出口輕工業產品及部份重工業產品、進口原料的發展階段（見本文第二節說明），然而日本無論在糧食或消費財的進出口供需上，皆有透過帝國內組織化的殖民地分工，進而壟斷亞洲各地市場的企圖。<sup>112</sup>首先在糧食市場上，儘管日本限制帝國內朝鮮及臺灣的米向中國輸出，使日本帝國對中國的米進口量在 1930 年代初期趨向減少，從而使泰國、緬甸等地對中國的米進口量，與前此時期相比顯著增加。<sup>113</sup>然而除此之外，在亞洲其他商品市場方面，皆可見日貨勃興之後，

<sup>109</sup> 高事恆，〈中國與南洋貿易之展望〉，頁 20。

<sup>110</sup> 高事恆，〈中國與南洋貿易之展望〉，頁 20。

<sup>111</sup> 高事恆，〈中國與南洋貿易之展望〉，頁 19。

<sup>112</sup> 中嶋航一，〈日本帝國的食糧需給構造の分析〉，《アジア發展のカオス》（東京：勁草書房，1986），頁 196-197 指出，1930 年代朝鮮、臺灣產米豐收，但以輸往日本內地為主；堀和生，〈日本帝國的膨脹と植民地工業化——東アジア國際關係——〉，收入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廣島：溪水社，2001），頁 108-109。

<sup>113</sup>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國米》（上海：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昭和 16 年），頁 214-217。



國貨受到壓縮所呈現彼長此消的狀況。如在糖市方面，1930 年代由於臺灣此一日本帝國最大糖生產地的出產，除滿足日本內地所需之外，餘均用以輸出，又以中國為最大輸出市場，且自 1934 年後呈現對華輸出激增之情況。<sup>114</sup>同期間日本又大舉向中國走私進口，從而影響南洋糖類向來在中國進口市場所佔的強勢地位。<sup>115</sup>1930 年代印尼糖對中國的進口，相對於 1920 年代明顯趨於萎縮。<sup>116</sup>其他消費財市場方面，也可發現日貨大舉搶攻亞洲各地市場，影響中國國貨對東南亞的輸出。如華茶在南洋的推銷地位，已漸形衰落，遠不如前。但據爪哇領事館稱，日本帝國臺灣進口之茶則銷路暢旺，達 400 萬公斤，超過中國華茶十倍。中國盜器在爪哇銷售者，亦因日貨競爭，而逐漸失去市場。<sup>117</sup>其他多項日常用品皆可見如是之現象。<sup>118</sup>這些事實說明，東亞各國產業多與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相關，各國之間生產條件差異不大，經濟間的相互競爭明顯大於彼此的互補，單一商品之貿易對手國具高度的替代性。這種經濟形態使日本帝國圈內各殖民地國間的貿易分工，形成自成一體的產業結構，可以對他國產品發生替代排擠效應，從而影響帝國圈外亞洲國際市場的

<sup>114</sup> 駐新義州領事館，〈一九三四年上半期內日本棉布輸出之激增狀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7 號 11（1934 年 11 月），頁 301，說及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糖對華輸出銳減，每月輸出額僅 5、6 萬 picul，自 1934 年後，以中日感情漸趨溫和，排斥日貨之風漸熄，加以中日匯兌關係，一般唯利是圖之華商向日方訂貨者俄然增加，僅 8 月一個月交貨者即達 357,000 picul。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頁 34-35 提到，1930 年日本及臺灣輸入中國之砂糖計 20,919,330 海關兩，1931 年輸入 20,504,716 海關兩，1932 年 1,033,305 金單位，1933 年輸入 4,748,262 金單位，1934 年則輸入 4,129,876 金單位。1932 年一海關金單位相當於每海關兩一兩一錢八分四厘。

<sup>115</sup> 〈支那經濟界と對本邦品貿易の近況〉，《海外經濟事情》，第 7 年號 20（昭和 9 年），頁 6。報載日本砂糖走私進口，充斥華中、華南市場，由於日本砂糖之低價促銷，爪哇糖銷售無門。

<sup>116</sup> 蘭領東印度原佔中國進口洋糖比例最高，1931 至 1933 年以來，進口額分別為 22,122,133、18,824,836、10,403,189 金單位，有逐年下降之勢。〈支那經濟界と對本邦品貿易の近況〉，頁 6。

<sup>117</sup> 《江西民國日報》，1933 年 5 月 10 日，第 1 版；駐泗水領事館，〈國貨在爪哇市場之消沉與日貨之勃興〉，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6 號 1（1933 年 1 月至 3 月），頁 107-112。

<sup>118</sup> 駐巨港領事館，〈日貨傾銷南洋之概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6 號 1（1933 年 1 月至 3 月），頁 132-133，說：「一般土人亦多愛用華貨，因其製造精良，堅固耐用。例如汗衫、毛巾、皮箱、電筒之屬，銷路頗為不惡，其他如罐頭食品、日常及化妝用品，亦有相當之輸入。……，華僑商人已覺不能與之競爭。」駐泗水領事館，〈國貨在爪哇市場之消沉與日貨之勃興〉，頁 107-112，列有各種國貨與日貨銷售量，可資比較其在市場之興衰消長。

供需。尤以中日兩國此消彼長、產業相剋多於相長的態勢為然。

1930年代日本在亞洲經濟中所建立的強勢角色，事實上摧毀了亞洲以中日兩國為首，且以棉業為基軸的國際分工體制，並就此確立了日本在亞洲雁行發展體系中帶頭雁的角色。所謂雁行發展理論，乃日本學者赤松要於1930年代提出，並以為可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中日經濟關係為代表。<sup>119</sup>其表現之發展形態，即「印度、中國棉花生產——日本、中國紡織業——日本、中國棉織物業——亞洲域內消費」，換言之，亞洲對歐美輸出一級產業產品（石油、橡膠、砂糖、茶），提升了亞洲人的購買力，刺激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亞洲人不僅消費歐洲商品，更重要的是，在亞洲內部進行米棉糖貿易，並換取日、中的棉製品。<sup>120</sup>然而在此一亞洲內部國際分工體制所發展出以「棉業為基軸」的工業化過程中，中國與日本所共同扮演紡織業及工業化核心的角色，在1930年代事實上受到來自日本的嚴重挑戰，日本且從此確立了其在亞洲棉紡織業獨領風騷的局面。因為由商品種類觀察，1930年代日本輸往南洋商品，即以棉織品為大宗，約佔40%以上，其次為絲織物及人造絲織物，再次為針織物、鐵製品、陶瓷器。<sup>121</sup>而與日貨相較，中國布的市場佔有率，在南洋各國之間平均僅佔0.9%，<sup>122</sup>比例甚微。與此互為對照，棉貨類雖是「中國對南洋唯一主要的項目」，為數不過1,000萬金單位之譜。<sup>123</sup>有數項證據顯示，中國輸往東南亞所剩無幾的棉布，大部份係日本在華紡織廠的棉織品，並非中國真正的國貨。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陳公博說：「棉紗、棉布雖為出口之大宗，可是在華的日廠出品倒佔了百分之七十五。」<sup>124</sup>實業部國際貿

<sup>119</sup> 赤松要在他〈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雁行模式」。參見 K.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Economics*, Preliminary Issue 1 (March-August, 1962), pp. 17-20.

<sup>120</sup> 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基本問題〉，收入氏著，《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頁118-119。

<sup>121</sup>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頁64。

<sup>122</sup> 邱致中，〈日貨傾銷南島與日荷會議之前瞻〉，《中南情報》，期1（1934年4月），頁18。

<sup>123</sup>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頁36-38。

<sup>124</sup> 陳公博，《四年從政錄》，頁234-235。

易局局長何炳賢也有類似的觀察，他以為，棉紗出口 70%以上均為在華日本紡織廠出品。<sup>125</sup>日本「在華紡」就技術上而言，同時也是各國勢力競逐的中國棉紡織市場的領導者。<sup>126</sup>此一事實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顯示中國以紡織品為代表的製造品，正逐漸喪失亞洲的海外市場，中國儼然只是亞洲一級產品的需求者。即便中國專擅的紡織業部門，在亞洲國際分工中，亦較日本處於下游的地位；中國可與日本進行垂直分工的部門，可能比水平分工的部門來得多。這一趨勢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變，使日本在亞洲產業體系中樞及支配的地位，趨於鞏固。

然而亞洲國際分工體制中，中國地位的下降此一現象所反映的，實則是，華僑做為亞洲生產力的主體，實力已大不如前。近代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貿易的發展，很大程度即是依賴華僑消費與投資市場的存在。<sup>127</sup>也正是由於這一特殊消費與投資事業市場的存在，推動中國與東南亞間若干相關產業的生產，並影響華僑的資本累積與資本形成，以及東南亞各地民族資本的發展。<sup>128</sup>然而與國際事務緊密聯繫的華僑資本，包括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無論在資金、生產和市場等條件方面，都無法與日本帝國競爭，不斷受到蠶食鯨吞。橡膠大王陳嘉庚，為日人所迫而倒閉破產，<sup>129</sup>以及日人在南洋積極從事甘蔗

<sup>125</sup> 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上），頁 42；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頁 117 提及：1930 年代上海紡紗業日漸發達，逐漸取代日本、印度棉紗，棉布方面也進行進口替代，威脅日本棉布，進而向東南亞輸出。證諸陳公博的說法，杉原薰的這種說法與事實有出入。

<sup>126</sup> 森時彥說到上海「在華紡」支配中國棉紡織業市場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上海日商紗廠在最前頭，接著是聚集在上海的英商紗廠、上海華商紗廠及青島的日商紗廠，然後是為數眾多的地方華紗廠尾隨其後的雁行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是在一九二〇後半期到一九三〇前半期形成的。」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的歷史研究〉中文提要，見氏著，《中國近代綿業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頁 5。這個雁行模式的確立，說明了中國對東南亞的輸出為何以「在華紡」居多。

<sup>127</sup>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頁 20。

<sup>128</sup> 戴一峰，〈閩南華僑與近代廈門華僑經濟的發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68-69。

<sup>129</sup> 〈檳榔嶼領事館報告〉，《僑務月報》，卷 1 期 5（1934 年 5 月），頁 115；《西北文化日報》，1935 年 8 月 20 日，第 7 版，亦提及「日本貨品之積極傾銷」，為僑胞經濟衰落、陳嘉庚工廠倒閉的原因。

栽培，「糖王」黃仲函及李全才等之糖廠陷於經營困境，<sup>130</sup>這些少數富商巨賈的處境固然不論，絕大多數華僑所經營的中小種植園、中小錫礦場、代理商業、仲介商業、零售商業等，就更不用說了。<sup>131</sup>所以華僑的失業，不只是亞洲通商網絡的失調，也是華僑在亞洲生產力的流失。

在上述亞洲內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附帶觀察亞洲各部與區域外各國國際分工的關係。1930年代中國對東南亞貿易入超擴大，在中國進口總額中佔12%~16%，出口總額佔4%左右。儘管如此，東南亞卻成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貿易夥伴。<sup>132</sup>固然，根據此一事實，我們確實可以贊同日本學者的說法，亞洲確實向世界市場統合，但並非僅向歐美依賴，而是創造出新的亞洲國際內部分工體制，也對亞洲依賴，特別是在生活必需品部份。<sup>133</sup>但沒有證據顯示，亞洲各部輸入亞洲產品有更加迅速的傾向，或是亞洲各部最後購買的是亞洲型產品，而非歐美型產品，從而使內部關聯效果所產生進一步刺激需求的作用，在亞洲各國國際貿易上顯現出正面效果。事實上，中國對亞洲區域外的依賴，不小於對區域內的依賴。1935年，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歐美各國含英、美、德、法、加拿大，佔中國進口總額的41.9%，出口總額的44.4%。亞洲含英國在遠東和亞洲的殖民地、香港、日本、南亞，則佔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的38.6%，出口總額的39.8%。1936年，歐美各國對中國進出口同步上升，佔中國進口貿易的比重增至52.0%，出口總額的48.6%，亞洲各國佔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比重皆呈下降，進口減至35.1%，出口減至38.1%。<sup>134</sup>即便就基本生活必需品，如食料、棉、糖而言，中國對亞洲

<sup>130</sup>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頁292。經濟危機期間，日人在南洋投資農作栽培事業，並投資433萬8,000多元，在英屬北婆羅洲、沙勞越、荷屬爪哇、美屬菲律賓等地，積極從事甘蔗栽培，由於可以直接支配提煉砂糖之原料生產，使華僑糖廠難以為繼，能開工生產的僅二、三家而已。至1937年，能維持下來的僅有「糖王」黃仲函的四家糖廠和李全才的一家。

<sup>131</sup> 〈最近に於ける支那海外移民の經濟的地位〉，《滿鐵調查月報》，卷13號6（昭和8年6月），頁157-161。

<sup>132</sup> 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頁58、60、270。

<sup>133</sup> 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頁113-127。

<sup>134</sup> 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頁58。

區內產品的依賴，較之以往也呈下降的走勢。不只 1932 年棉麥借款，增加了美國棉麥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sup>135</sup>正規貿易中，北美也是中國小麥、麵粉及棉花的重要供給地。<sup>136</sup>所以，日本雖然是區域經濟強國，東亞和東南亞成爲其保持經濟優勢的地區，但是以日本爲領導的亞洲，並非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地區。這意味 1930 年代以前，日本本身不是亞洲地區經貿體系的支柱，包括日本在內的整個地區，係依附在以歐美爲中心的經濟體系之上。

## 六、從通商網的興衰看遠東中心市場的變動

1930 年代，日人經濟勢力積極推向東南亞之後，當地華僑在國民經濟上決定性的影響力開始下降，可見於商貿網絡的變化上。1930 年代之前，東南亞之商貿網絡絕大部份均由華僑掌握。儘管在商品輸出入方面，華僑比歐人或他外商稍有遜色，但與輸出業相關的消費者及生產者的民間配貨或聚貨網絡，幾乎均由華僑獨佔，國外大貿易商在當地經營商社所僱用的買辦，也幾乎非華人莫屬。<sup>137</sup>可以說，華僑推動了東南亞商品的海外市場化，並帶來東南亞各地區之間經濟的相互連帶關係，而根據此一關係發展的商品流通網，也成爲東南亞與西方之間商貿關係與商貿網絡發展的基礎。<sup>138</sup>由於華商在商品販賣上係多角經營，除銷售國貨之外，也兼售日貨與歐貨。<sup>139</sup>排斥日貨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英國商品對東南亞的輸出大量增加，獲利也最多。日貨在東南亞傾銷之初，華商雖因抵制日貨而拒售日貨，同時卻加強銷售英貨，因而不致蒙受太大的損失，<sup>140</sup>華僑所握伸介實權之地位亦未曾發生根本

<sup>135</sup> 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之全貌》，頁 82、84；陳公博，《四年從政錄》，頁 220。

<sup>136</sup> 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上），頁 36-38；陳公博，《四年從政錄》，頁 151-152、169。

<sup>137</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昭和 14 年），頁 124。

<sup>138</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頁 124-128。

<sup>139</sup> 謝懷清，〈中日荷印貿易現狀鳥瞰〉，《中南情報》，期 8（1934 年 10 月），頁 41；黃寄萍，〈南洋市場受日貨傾銷的檢討〉，《中南情報》，期 5、6（1934 年 8 月），頁 56。

<sup>140</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頁 197-199。

動搖。<sup>141</sup>然而，價格低廉的日貨，最能投合深受經濟恐慌之苦的東南亞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不僅是東南亞的土著商人，還有印商、歐商均爭先恐後地經營日貨。華僑排斥日貨，反而製造各國商人積極熱切和日商來往的機會，特別是勢力僅次於華僑的印度商人，他們由銷售英貨轉而銷售日貨。<sup>142</sup>華僑地盤漸漸被利用此一網絡的各方勢力侵入，<sup>143</sup>隨著日貨銷售的增加，華僑配銷網相對低迷不振，東南亞商貿網絡漸漸變成日商的銷售網絡。

日本直系運銷組織成功地推進了日貨的銷路，伴隨著華商產品的銷售無力，隨即使香港、新加坡轉口港的地位面臨挑戰。過去凡是東南亞商品的海外市場化，以及海外商品之輸入東南亞，均係透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華商進行。<sup>144</sup>1930年代以前，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直通航路不甚發達，幾乎沒有直航日船或外國船隻居中聯繫，其間的商貿往來勢須借重轉口貿易，日貨因此仍須經華僑之手進出東南亞，並利用新加坡、香港這條商貿大道。<sup>145</sup>在日貨大舉攻佔東南亞之前，經香港、新加坡輸入之貨品幾乎全部是中國產品，1930至1931年中國貨大體佔了80%，日本品只佔了15%。<sup>146</sup>1931年後，中國商品經二港者逐漸減少，但日貨大量傾銷以後，不經二港的日貨直接輸出額顯著增加，日貨在二港中所佔比率因而逐漸下降。1930、1931年後，日貨經二港輸入東南亞的比例，佔日貨輸入總額的35%。在此之前的數年直接輸入額及轉口輸入額，各佔日貨進出口總額的一半，但到了1935、1936年，日貨直接輸出入額佔總額的比例可達九成，剩下未滿一成的日貨，才由從事小

<sup>141</sup> 謝懷清，〈中日荷印貿易現狀鳥瞰〉，頁41。

<sup>142</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泰國的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頁204、229-230。

<sup>143</sup> 清水洋、平川均，〈日本—英領マラヤ間貿易の擴張——シンガポールを中心として〉，《からゆきさんと經濟進出》（東京：コモンズ出版，1998），頁111，曾提到1930年代初期歐美商社與亞洲商人在南洋的共生關係，本文以為這樣的發展不利於華僑商人。

<sup>144</sup> 興中公司，《南洋華僑的研究》（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6），頁50-51。

<sup>145</sup> 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第4章。

<sup>146</sup> 〈暹羅市場に於ける日本品の地位（二）〉，《南洋協會雜誌》，卷18號12(1932)，頁65。

規模貿易的華僑經由香港、新加坡進行運送與交易。<sup>147</sup>日貨直接輸出額顯著增加，不只影響中國對東南亞的輸出，也連帶影響東南亞對中國的輸入，香港、新加坡之間的聯繫因而不似以往密切，甚至新加坡對外輸出入貿易中，減少最顯著的即是對香港的貿易。<sup>148</sup>根據統計，1928 年新加坡與香港的輸出入貿易總額為 4,900 萬弗（香港銀元單位），1933 年滑落至 785 萬弗。1928 年香港對新加坡輸入額有 3,300 萬弗，1933 年萎縮至 365 萬弗。新加坡對香港的輸出，在 1932 年有 207 萬弗，然而到了 1933 年即急降至 54 萬 6,000 弗。總計這段期間，輸入減退了九成，輸出減退幾達七成，<sup>149</sup>香港及新加坡轉口機能明顯下滑，<sup>150</sup>正可見華僑網絡不敵日本商品直線運銷之競爭。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以來，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即以華僑商貿網絡為主，把東南亞、東北亞廣域的交易圈聯繫起來，共同構成遠東的中心市場。<sup>151</sup>然而，1930 年代初期經濟蕭條期間，做為擁有多邊貿易網絡的商業中心，新加坡集散地功能的角色遠比香港受到更為嚴厲的挑戰，從而使其不能維繫長久以來與上海或中國之間頻繁的商貿關係。僅就新加坡所在的南洋一帶而言，原先鄰近各地，如蘭領東印度、暹羅、英屬婆羅洲、緬甸、印度等，皆為其貿易往來的範圍，形成一個以新加坡為中心的加工貿易網。<sup>152</sup>1930 年代初則只有婆羅洲、爪哇、暹羅的一部份與其有經貿往來。<sup>153</sup>影響所及，這些地方早先

<sup>147</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泰國的華僑》，頁 203。

<sup>148</sup> 〈馬來對英本國及英領貿易近狀〉，《南洋協會雜誌》，卷 21 號 3（1935 年 3 月），頁 22。

<sup>149</sup> 〈馬來對英本國及英領貿易近狀〉，頁 22。

<sup>150</sup> 許多資料說明新加坡、香港中介轉口港功能的下滑，如〈蘭領印度對香港貿易概況〉，《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 7 年號 16（昭和 12 年），頁 38；〈1927~1934 年支那對外貿易的回顧〉，《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 5 年號 15（昭和 10 年），頁 11。

<sup>151</sup> 杉原薰根據：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英領馬來、緬甸及濠洲に於ける華僑》；華南銀行調查課，《蘭領印度商業世界に於ける華僑》；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等資料提示，圖繪出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城市以華僑為主之商貿網絡，但未做任何說明或分析。見杉原薰，《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頁 315。又，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134-135 也提到，上海、香港、新加坡是遠東的中心市場。

<sup>152</sup>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 315。

<sup>153</sup> 〈新嘉坡は關稅港となるか（一）〉，《南洋時代》，卷 4 號 2（1933），頁 56-57。

經新加坡而後轉運至世界各地的商品，或則不登陸，或則已不靠港停泊。<sup>154</sup>新加坡交易圈明顯縮小後，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許多商貿活動多依賴香港以保持聯繫。例如，早先與香港、新加坡往來皆屬密切的暹羅，即傾向與香港有愈來愈深的關係。<sup>155</sup>暹羅穀子的出口地，早先經新加坡轉口者較香港為多，1930年代以來，情勢逆轉，改以經香港轉口者為多。<sup>156</sup>荷屬印尼華僑將爪哇砂糖運至中國，亦僅行經香港、上海等地，即將兩地雜貨運至印尼。<sup>157</sup>法屬印度支那對外之經貿往來均經海防，但這段期間與海防關係最密切的首推香港。<sup>158</sup>這可以說明新加坡及其為中心的華商網絡，與香港或上海的關係，不似以往。

與上述新加坡的對外關係做比較，香港做為中國南方的集散中心，基於地緣上的相近，在經濟蕭條期間其與上海仍然相互依存。<sup>159</sup>香港自1932年以來，經濟始終疲弱不振，影響所及，對外貿易整體縮減。1934年，香港貨物輸入總額4億1,590萬弗，與1933年相比，總額減少17%，又與1932年相比，輸入總額減少了33.3%。就貨物輸出部份而言，1934年香港輸出總額為3億2,510萬弗，與1933年相比，輸出總額減少了19.4%，與1932年相比，輸出總額減少可達31.1%。<sup>160</sup>1935年，香港的貨物輸入額再下跌至3億6,499萬弗，比1934年減少了12.2%，貨物輸出額則下跌至2億1,703萬弗，較1934

<sup>154</sup> 興中公司，《南洋華僑の研究》，頁50-51。

<sup>155</sup> 〈新嘉坡は關稅港となるか（一）〉，頁57。

<sup>156</sup> 1930至1931年暹羅米穀輸往新加坡者佔總出口37%，往香港者佔27%。1931至1932年往香港者佔33.7%，往新加坡者卻佔27.8%。見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下），頁621-622。

<sup>157</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三〇年代蘭領東印度之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5），頁198。

<sup>158</sup>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法屬中南半島之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頁127-128。

<sup>159</sup> 就香港在中國對外貿易額中所佔的地位觀察，香港轉口港的重要性，1900年以前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其後則趨於衰退，見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下），頁794。1900年以後香港趨於衰退，與太平洋航線的發展及日本直線經營的貿易方式息息相關。儘管如此，其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仍更為密切。見〈中華民國と香港の貿易關係〉，《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5年號19（昭和10年），頁9、24。

<sup>160</sup> 〈香港貿易概況〉，《海外經濟事情》，第8年號6（昭和10年3月），頁59。



年減少了 16.6%。<sup>161</sup>香港對外貿易整體走向低迷萎縮之際，中國對香港的貿易也大為滑落。香港輸入中國的貿易額，1933 年僅 20,900,000 香港兩，此僅為 1923 年經濟高峰期輸入總額的 42%。<sup>162</sup>但低潮的貿易關係仍無礙香港以中國為主的經貿關係。無論是各國、華北、日本與華南之間的貿易，或是日本、華北、華南、南洋之間的貿易，多須經香港轉口進行。<sup>163</sup>南洋商品經香港轉口後，多輸往上海才轉運汕頭、福州各地。<sup>164</sup>華北、華中貨物多於上海集散，而後經香港轉運南洋。<sup>165</sup>可知香港作為中國與東南亞間轉口港的地位，自一次大戰建立其重要性後，至此未曾改變。<sup>166</sup>

上海、香港與新加坡的關係轉趨不振，與日本大阪、神戶的經貿關係，卻有急速攀升之勢。<sup>167</sup>就日本對香港的輸入而言，1932 年，日本輸入商品總值 2 萬 1,280 千弗，佔香港全部商品輸入總額的 3.4%；1933 年，商品輸入額增加至 2 萬 5,289 千弗，佔輸入總額的 5.8%。<sup>168</sup>1934 年，日本對香港的輸入額更見增加，佔輸入總額的 8.8%，輸入總值更躍進至 3 萬 6,669 千弗。<sup>169</sup>1935

<sup>161</sup> 〈香港貿易年報〉，《海外經濟事情》，第 9 年號 6（昭和 11 年 3 月），頁 57-58。

<sup>162</sup> 〈中華民國と香港の貿易關係〉，頁 25。

<sup>163</sup> 內田直作，〈自由貿易港としての英領植地香港（二）〉，《支那研究》，號 40（昭和 11 年 3 月），頁 162-168。

<sup>164</sup> 〈蘭領印度對香港貿易概況〉，頁 37。

<sup>165</sup> 吳承禧曾提及，經營僑匯的銀行在僑匯的買賣與運用上亦是如此。對南洋賣出的外匯，收進港、滬本埠的錢以應付廈門來的匯票，港、滬賣出的外匯，則藉以應付僑匯。所以，從金融上亦可見上海、香港之間密切的經貿關係。見吳承禧，〈廈門的華僑匯款與金融組織〉，《社會科學雜誌》，卷 8 號 2（1937 年 6 月），頁 216。

<sup>166</sup> 一次大戰前，中國與歐美的貿易多經香港轉口，戰後中國同歐美建立了更直接的貿易關係，香港作為貿易中轉港的地位下降，而作為中國同其他東南亞國家間中轉港的地位則提升了。見鄭友揆著，程麟蓀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頁 119。

<sup>167</sup> 見〈對支貿易を中心としたる大阪對外貿易概要〉，《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號 306（昭和 7 年 11 月），頁 5。又，〈香港貿易減退〉，《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 3 年號 18（昭和 8 年），頁 30，曾提到英國對香港的輸入總額減少，由 1932 年的 13.8%減至 1933 年的 10.9%；對照的說，日本則呈增加之勢，由 1932 年的 2.9%，上升至 1933 年的 4.4%。

<sup>168</sup> 內田直作，〈自由貿易港としての英領植地香港（二）〉，頁 167。另一估計說，1932 年上半年為 2.9%，1933 年上半年則增加至 4.4%。1932 年上半年輸入額為 9,731 千弗，1933 年上半年增加為 11,349 千弗。〈香港貿易概況〉，《海外經濟事情》，第 6 年號 42（昭和 8 年 10 月），頁 1-2。

<sup>169</sup> 內田直作，〈自由貿易港としての英領植地香港（二）〉，頁 167；〈香港貿易概況〉，《海

年後，日本的貨物輸入總額約增加了 646 萬 3,000 弗，該年輸入額為 4 萬 3,132 千弗，所佔比例則上升至 11.8%。<sup>170</sup>日本商品在香港消費物品中已顯著地佔有一席之地。<sup>171</sup>

就日本與上海的經貿關係而言，很多日本商人就近到上海開設洋行，推銷日本產品，日本洋行且有取代歐美洋行，進而控制上海和日本間貿易的趨勢。1936 年，上海 114 戶日商洋行中，除少數老牌如三井、三菱之外，約有 80% 是專營上海、日本間貿易，而歐美洋行專營上海對外貿易的，則逐漸減少。<sup>172</sup>1931 年度，上海對日貿易總額幾達 3 億元之譜，可是該年度對日貿易的入超額也超過 1 億元。1932 年淞滬戰役發生後，對日貿易減退四分之三，只有 6,700 萬元，戰爭結束後稍有恢復。1933 年對日貿易總額上升至 1 億 1,200 萬元，其中上海由日本進口 5,000 萬元，向日本輸出約 6,002 萬元。1934 年對日貿易總額略減為 1 億元，上海對日輸出 5,400 萬元，日本向上海輸入 5,200 萬元。1935 年對日貿易總額也達 1 億元，上海對日輸出僅 4,900 萬元，日本對上海的輸出則增加至 5,700 萬元。<sup>173</sup>然而即使就 1935 年度與九一八事變之前的 1930 年比較，輸入仍然減少 72%，輸出減少 27%，輸出入總和減少 64%。

日本經濟勢力節節進逼，上海、香港與日本大阪、神戶等港之間密切往來所形成的新三角貿易關係，取代上海、香港與新加坡早先所維持的三角經貿關係，此可由航運網、金融網、通商網或移民網的變動進一步得知。就戰前的航運業發展而言，中國的航運業僅立足於「內陸自足經濟」基礎上，並沒有以海洋航路做為發展國際貿易手段的強烈認知。<sup>174</sup>南洋僑商眾多，然而

---

外經濟事情》，第 8 年號 6，頁 59-60。1934 年數字以〈香港貿易概況〉一文為準。

<sup>170</sup> 〈香港貿易年報〉，頁 58。

<sup>171</sup> 內田直作，〈自由貿易港としての英領植地香港（二）〉，頁 167。

<sup>172</sup>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上海對外貿易》，卷 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頁 200。

<sup>173</sup> 〈上海を中心とす通商概況〉，《經濟月報》（上海商工會議所），卷 10 號 3（昭和 11 年 3 月），頁 2。

<sup>174</sup> 佐波宣平，〈支那航域に於ける日英船〉，收入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編，《東亞交通論》（京都：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昭和 17 年），冊 1，頁 2-14。

航運往返，華籍輪船所佔地位甚微。行駛新加坡、香港、汕頭、廈門等處航線之華籍輪船公司，一如日趨蕭條的華僑產業，現狀多屬不景。<sup>175</sup>直到一次大戰期間，英國以發展對蘭領東印度、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航線，在東亞海運上佔有壓倒性優勢，華僑於廈門經汕頭至新加坡的航線上，亦小有地位。中英之間在航運經營上多所提攜，華人利用英船最多。1920年代，日本開闢其與東亞各國定期航路，與英商展開競爭。經濟恐慌後，自大阪、神戶出發的商船、郵船，由於運費低廉，絡繹於途，日本幾乎獨佔以其為中心的東洋主要航路。<sup>176</sup>日本與新加坡貿易的大部份亦皆由日本輪船運送。華僑至東南亞經商或移民，過去搭乘中英籍輪船公司的習慣開始發生些微轉變。<sup>177</sup>

中國以上海、香港、大阪、神戶為中心所形成的新的多角商貿網絡，也可見於支撐經貿圈的金融網絡。以信局為中心所形成的華僑匯款網絡，把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金融市場結成無比細密的網絡，<sup>178</sup>但外國銀行為了吸收現金，不甘落後地參與匯款業務。儘管英系匯豐銀行充分利用華僑，透過跟他們的合作，擴大了經濟貿易圈，但在1930至1935年經濟恐慌期，華僑匯款整體減少，而且透過銀行的匯款減少率要比信局多得多。<sup>179</sup>也就是處理華僑匯款的銀行在此期間受到更大的衝擊，許多支店設於新加坡、上海、香港的華僑銀行，因而倒閉或合併。<sup>180</sup>當地西商銀行，如法屬印度支那銀行、英系

<sup>175</sup> 〈中南航運事業之調查〉，《僑務月報》，卷4期3(1935)，頁11-12。

<sup>176</sup> 佐波宣平，〈支那航域に於ける日英船〉，頁11-14。

<sup>177</sup> 東亞海運營業部企畫課，《華僑移動狀況》（出版地不詳，東亞海運，昭和16年），頁36。

<sup>178</sup> 有關信局在匯送華僑匯款上的功能及貢獻，可見於以下的討論或報導：吳承禧，〈廈門的華僑匯款與金融組織〉，頁217-224；夏誠華，《近代廣東省僑匯研究(1862-1949)——以廣、潮、梅、瓊地區為例》（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協會，1992），頁14-18；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華僑調查彙報》，輯1（上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昭和15年），第3編，頁96-116；根岸侖，《華僑雜記》，頁141-146；葉淵，〈民信送金與中國經濟〉，收入財團法人南洋協會編纂，《南洋の華僑》（東京：日黑書店，昭和17年），頁350-362。

<sup>179</sup>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華僑調查彙報》，輯1，頁113。

<sup>180</sup> 華僑系銀行中，總分行分別設於上海、廣州、香港、暹羅的廣東銀行，與總分行分別設於香港、廣州、上海的香港國民商業銀行，在1934、1935年先後停業；總行設於新加坡的華商銀行、和豐銀行、華僑銀行於1932年合併。見興亞院華中連絡部，《華僑調查中間報告》，昭和16年，頁216、218、219、227、229。游仲勳著，楊建成主編，《華僑政治經濟論》（臺北：中

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等，面臨更大的經營困境。然而在另一方面，大阪、神戶的日本貿易商和華僑，卻恆常受到當地橫濱正金銀行、臺灣銀行在貸款和匯兌方面的穩定服務，他們將款項由大阪、神戶向上海、廣東、香港、新加坡匯出或匯入。<sup>181</sup>日系銀行如臺灣銀行、橫濱正金銀行、華南銀行，也在新加坡增設代表處，除了給予南洋日僑在匯兌及資本援助方面莫大的便利外，<sup>182</sup>更企圖加入東南亞舊有的以華僑匯款為主要業務的海外金融組織。<sup>183</sup>橫濱正金銀行在華的匯兌市場地位，因而直逼以匯豐銀行所代表的華僑匯款之中央銀行在華僑匯兌市場的地位。<sup>184</sup>可以想見，向來處理南洋華僑匯款業務的中西銀行，受到蒸蒸日上的日本金融網多重威脅。

1930年代，以新加坡為聚點的華僑，失業回國的也日益加多。從前由汕頭出國的華僑，每年有12、13萬人，至1930年代初期，只有5、6萬。至1935年，由汕頭進出的人數，據該年7、8、9三個月的統計，出國僑商5,740人，歸國僑胞有15,204人，入超竟達9,000餘人。<sup>185</sup>又據另一份調查報告指稱，1931至1933年的三年間，從香港歸國的華僑達108萬人，出國者雖達61萬人，其中不少人隨後也都經新加坡、香港打道回府。1934年至1936年的三年間，從香港、新加坡出國的則有6萬人，回國者則達21萬人次。<sup>186</sup>

轉口機能失去之後的新加坡，顯然不再是東西洋貿易的樞紐。在貿易量大增的承平時期，新加坡跟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與金融關係，可以聯

---

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4），頁106也提到華僑體系銀行的合併。

181 神戶稅關，《神戶在留華僑及其の取引事情》（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昭和7年8月），頁61；日本商工省貿易局，《阪神在留の華僑と其の貿易事情》（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昭和12年），頁117-118也提到，大阪的華僑不只受到日系銀行金融方面的服務，也受到中國系銀行，即中國銀行大阪支店，在匯兌方面提供的服務。

182 臺灣銀行北頭取息調查課編，《英領馬來經濟事情》（臺北：臺灣銀行北頭取息調查課，昭和16年），頁144。三井銀行也在南洋設支店。見塗琳，〈日本南進政策現階段之透視〉，頁17。

183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南洋華僑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昭和14年），頁100。

184 〈上海的外國為替銀行〉，《經濟月報》，卷9號7（昭和10年1月），頁24。

185 《中南情報》，期1（1934年4月），頁17。

186 企畫院編纂，《華僑の研究》（東京：松山房，昭和17年），頁79-81；東亞海運營業部企畫課，《華僑移動狀況》。

繫亞洲和歐美，但日本勢力抬頭之後，無論從金融網、華僑移民網、商貿網都可以說明，早先因貿易和華僑而崛起的新加坡，漸漸喪失其維繫中西的地位。新加坡既不能做為東南亞金融業和經濟的中心，也失去其做為東南亞華僑經濟中心的光彩。<sup>187</sup>有一段報導可資證明：

以新加坡為中心之海峽殖民地，乃東洋產物，尤其與熱帶產物之集散地，……輸入額衰退，未必與英國有關，而經由該地運往日本之……特產物，近年日本竭力設法直接輸入，致使該地失去東洋貿易中心地之價值。<sup>188</sup>

1930年代東南亞華僑經濟中心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既已沒落，不難想見東南亞華僑匯款何以急劇減少，以致造成中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更進一步說，1930年代中國經濟之陷入蕭條，可由遠東經濟中心的變動，窺其梗概。

## 七、結 論

總結本文所述，1930年代日貨大量進出東亞各地，是導致中國經濟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一歷史現象反映了數點重要的歷史意義，說明1930年代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轉折期。

### （一）亞洲商貿網絡的變化與兩大經濟圈的消長

首先從亞洲商貿網絡的變化與兩大經濟圈的消長來說。1930年代前半期，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對外擴張與侵略之際，亞洲經濟發展的特徵之一，不是各經濟圈逐步趨於整合，而是各自走向內向退縮，從事侷限一隅的地方性經貿活動。新加坡不再能聯繫印度東岸地區和東南亞、中國華南地區的經濟

<sup>187</sup> 新加坡既為東南亞華僑的銀行、金融業中心，而華僑的銀行、金融業中心，又使新加坡作為東南亞經濟中心的地位進一步鞏固。此一說法見 Wong Lin Ken, "Singapore: Its Growth as An Entrepot Port, 1819~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1 (March 1978), p. 312.

<sup>188</sup> 謝懷清，〈中日荷印貿易現狀鳥瞰〉，頁42。

活動，香港僅與華南經濟互動較為密切，<sup>189</sup>上海貿易活動趨於萎縮，在在說明原先光彩奪目的遠東中心市場，現在只能扮演區域性中心城市角色。<sup>190</sup>這種萎縮退避的經濟發展態勢，雖然與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不無關聯，但也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息息相關。大連港貿易量日趨增加，<sup>191</sup>並成為日本、朝鮮半島、東北與華北的聯繫樞紐後，華北鄰近的天津、青島，隨之獲得進一步發展；此外大連印尼航線開航，<sup>192</sup>漢口趁勢而起，凡此種種新情勢的發展，均使上述港口與上海處於分途競爭之勢，也搶走了香港中途轉口港的部份機能。<sup>193</sup>更進一步說，與香港分庭抗禮的日據臺灣也漸居要津，<sup>194</sup>新加坡為南洋中心點的角色有轉移至親日的印尼爪哇之勢；<sup>195</sup>大阪、神戶節節攀升的貿易量，不只推升了大連在渤海及黃海灣區聯繫中心的地位，<sup>196</sup>更使上海、香港與新加坡在遠東航線上的重要性遠不如以往。形成這些現象的原因，追根究底，實是由於東亞作為日本商品的消費市場，既與日本產地相距不遠，加以大阪、神戶等對外貿易通商港口，直接以二、三千噸的輪船為運輸工具，即可將日本產品廉價運送至各地，而不必如同過去須透過上海、香港、新加坡等遠東中心市場中介轉運。所以，隨著日本商品對外傾銷，亞洲內部商貿網絡開始發生變化。阪神、臺北、雅加達因運送日本商品而形成

189 《中南情報》，期 4（1934 年 6 月），頁 11-12。

190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壊と日本》，頁 377-381。

191 沈毅，《近代大連城市經濟研究》，頁 25-29。

192 〈新嘉坡は關稅港となるか（一）〉，頁 56-57。

193 根岸信，《華僑雜記》，頁 157。

194 林滿紅，〈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6（2001 年 12 月），頁 45-115；〈香港貿易概況〉，《海外經濟事情》，第 8 年號 6，頁 59。

195 〈新嘉坡は關稅港となるか（一）〉，頁 57；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三〇年代蘭領東印度之華僑》，頁 280。

196 駐神戶總領事館，〈神戶港之現在及其將來〉，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7 號 2（1934 年 2 月），有言：「神戶適為通大連之中心。」又，籠谷直人也說到，1930 年代日本大阪、神戶地區曾存在三個對亞洲通商的網絡，其一即是日商自大阪向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的出口路線。可見大阪、神戶貿易量的增加，推升了中國東北、華北的貿易量。見籠谷直人，〈アジア通商網と日本近代史研究〉，《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0），頁 16。

的新興貿易網絡，有愈趨發達之勢。相對而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集散中國、甚至歐洲商品連結成的商貿網絡，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中國北方港口重要性相對增加，與此一新發展趨勢互為呼應的是中國海外商貿關係的變化。也就是隨著兩條商貿網絡的興衰消長，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商貿網絡，由南三角的網絡結構——新加坡、香港、上海，漸漸走向北三角的網絡結構——阪神、上海、香港。中國地域重心推移至華北，背後潛在相對應的發展正是中國對外聯繫樞紐朝北移動。海運範圍廣大，遍於中國、南洋、印度，遠及非歐的大阪、神戶，不只是193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量最多的港口，其貿易量且居全亞洲第一，在世界貿易上也舉足輕重，<sup>197</sup>更是日本各港中對中國貿易量最多的港口。<sup>198</sup>可以想見，自一次大戰後，亞洲經濟重心逐漸推向神戶、大阪，到了1930年代，阪神做為日本向外擴張的策源地，在日本帝國主義推波助瀾的發展之下，已超越遠東舊有的中心城市及商貿網絡，穩居亞洲經濟新核心。兩條亞洲商貿網絡的興衰消長，以及遠東中心市場的變動，可以說明東亞，包括中國，何以在1932年日本經濟走向繁榮之後，反而持續發生經濟蕭條的現象。

此一遠東經濟的變動，同時也說明原先在東亞居於霸權的英美帝國主義，與新興的日本等經濟勢力，在東亞所發生激烈競爭之一斑。回顧過去歷史，上海、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躍居遠東中心市場的地位，不純粹是因其集散地區性的東方商品，還因為二十世紀初歐美商品在東亞漸有廣大的銷售量，這些城市因集散歐美商品，得與世界貿易網絡連接。1930年代以前，大中華經濟圈在亞洲一枝獨秀，當時以其為中心，周圍環繞著許多小經濟圈，這些小經濟圈透過香港、新加坡、上海等仲介轉口港，與中國維持若干經濟

<sup>197</sup> 1936年世界五大貿易港依序是：紐約、倫敦、神戶、鹿特丹、大阪。可見大阪、神戶是亞洲最大的貿易港。大西齋，《香港與海南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頁52。

<sup>198</sup> 大阪、神戶是日本對中國貿易的主要港口，1932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總額為2億5,800萬圓，大阪居首位，計有1億800萬圓，其次則是神戶6,300萬圓。橫濱的重要性遠為遜色，其對中國的貿易量只有2,700萬圓。見〈對支貿易を中心としたる大阪對外貿易概要〉，頁5。

關係。另一方面，做爲一個多元的交易網絡，歐洲商人也利用東亞華商交易圈，形成一個把香港、新加坡做爲孟加拉灣、南海、東海之間許多小經濟圈的轉口貿易與金融中心。<sup>199</sup>1930年代日本積極擴張對外輸出，以直航的貿易路線與亞洲各地維持密切聯繫，終將各小經貿圈整合於帝國的經濟勢力圈。日本此一策略不只搶走中國國貨的原有市場，也大幅搶走歐美舶來品的原有銷路，從而造成上述轉口港的沒落，以及大中華經濟圈的解體，原有許多小經濟圈也隨之煙消雲散。亞洲經濟從以大中華經濟圈爲核心的多元經貿圈，走向日本帝國經濟圈獨霸一方的局面，可以說明趨於蕭條的中國經濟，正面對一個蒸蒸日上的日本帝國，亞洲經濟秩序的核心，從而決定性地由中國移向日本。

## （二）中國經濟蕭條的兩種解釋

許多西方學者仍認爲1930年代美國實施白銀政策，導致中國大量白銀外流，對中國經濟傷害至深，是中國捲入世界經濟大恐慌的重要原因。本文無意忽略美國或帝國主義此等核心工業國家的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蕭條的關聯。1930年代，美國取代英國，成爲左右亞洲國際經濟秩序最具影響力的國家，<sup>200</sup>美國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手國，白銀外流在形成中國經濟恐慌的原因上，不可否認地仍具有第一義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表示日本此一中國第二大貿易對手國，對中國經濟危機的影響不具舉足輕重的意義。我們可以就此觀察東西方不同類型帝國主義各具特色的經濟策略。如果以他們各自標榜的名稱簡單地加以區分，或許可以說，1930年代歐美帝國主義重原料資源之掠奪，日本帝國主義重商品銷路之開拓。南洋或中國就做爲日本帝國主義的貿易對象而言，不僅是原料供給地，更有商品販路的重要性。這是因爲

<sup>199</sup> 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36。  
<sup>200</sup>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p. 178; 孔華潤，〈美國人領導東亞〉，入江昭、孔華潤編，《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頁1-27。



日本商品對外採取低價取量的行銷模式，在貿易總價上遠不及歐美各國龐大，但薄利多銷，可以大幅提高銷售量，進而擴大市佔率或市場規模。<sup>201</sup>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如此開擴商品販路的行銷模式，使日貨的傾銷嚴重威脅國貨出路，並導致中國經濟蕭條。相對於以白銀危機來解釋中國經濟危機的西方史觀，本文有關日貨傾銷的論述，或許可說是從亞洲觀點出發的東方史觀，對中國經濟蕭條成因的另一種解釋。

### （三）集團經濟與亞洲國際秩序

商品價格是決定商品海外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但商品的海外價格與對外匯率息息相關。根據本文正文有關商品市場與商貿網絡興衰消長的討論，可據以檢討各集團經濟國家的外匯政策對亞洲國際經濟秩序的衝擊。一般以為，1930年代風行一時的集團經濟(bloc economy)，是帝國主義國家確保市場佔有率的一種措施。為配合此一政策的施行，帝國主義國家除降低對外匯率之外，也多提高殖民地的通貨匯率。他們認為，在殖民地實施提高通貨匯率政策，一方面可使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產品的銷售市場，因為此政策利於帝國主義國家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帝國主義國家向殖民地投資與貸款，順利獲得紅利與利息。此一使亞洲殖民地維持匯率高水準的亞洲國際秩序，可見於二次大戰前英荷各殖民地與其東南亞各殖民地之間經貿關係的互動，它並促進了帝國主義國家產品的輸出。<sup>202</sup>1930年代的日本踵模前規，也實施降低對外匯率政策，希望利用上述帝國主義國際秩序，將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納入其勢力範圍，以鞏固並建立其帝國主義經濟秩序。學者以為，由於日本對維持匯率高水平的東南亞殖民地諸國創造了有利出口的条件，因而得以利用遍及各地的通商網絡，與東南亞各國維持「相互依存」

<sup>201</sup> 畢森在〈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一文中曾說到，日本貿易最顯著的現象，即輸出品之大量增加。1933年日貨輸出量，較1928年超過將近100萬噸。如用指數表示，貨量指數為112.7，貨值指數僅94.4。這表示日貨價格之跌落，出貨量大幅上揚。

<sup>202</sup>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Longman, 1953), Chapter III.

的經貿關係，<sup>203</sup>終於使其國際收支漸趨有利，並在 1932 年脫離經濟蕭條的困境。

1930 年代風行一時的集團經濟(bloc economy)秩序，由帝國主義國家所展現的保護主義特徵，不只發生在歐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南亞殖民國家，同時期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匯價關係也備受日本低匯政策的威脅，致相對於日本對東南亞的匯價，表現出明顯落差。事實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亞洲以中國為中心的銀貨圈，以及幾乎與殖民母國金貨相聯結的南亞、東南亞殖民地國家貨幣圈，呈現分裂的局面。1931 至 1935 年間，中國實施銀本位，其對外匯率因國際銀價相對於金價之急劇上漲而節節升高。緬甸、泰國、菲律賓、英領東印度這些英美殖民地的幣值對金貨圈及英鎊，呈不變或上升的走勢，中國對緬甸、泰國、菲律賓、英領東印度的幣值，自然攀高。相對於此，日本於 1931 年放棄金本位後，日圓幣值大幅下跌，日圓對印度、緬甸、泰國、英領東印度的幣值，巨幅下跌。<sup>204</sup>日圓與中國銀元相比，高下懸殊，顯然可見，前文已約略論及。<sup>205</sup>日貨可在中國與印度、緬甸、泰國、英領東印度等地四處泛濫，成功地搶奪他國、包括中國或華僑商品市場，<sup>206</sup>不純粹只是商品面上日本降低工資、節省勞動成本，使日貨成本較為低廉；在貨幣面上，日人刻意貶低幣值，日本商品相對於他國商品價格明顯偏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sup>207</sup>

<sup>203</sup> 籠谷直人，《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頁 177-182；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頁 20-22。

<sup>204</sup> 杉原薰，〈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頁 129。

<sup>205</sup> 厲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頁 70-71。譚秉文在〈日匯跌落的原因和影響〉一文中曾提及，日本在匯兌傾銷政策之下，貿易及無形收入持續增加，促進日本景氣復甦。駐巨港領事館，〈日貨傾銷南洋之概況〉，頁 132，說到：「日圓暴跌，日貨忽然大舉在南洋傾銷，……，各國在南洋之商業均大受影響。」又說：「金貴銀賤之時，國貨運銷南洋亦有價廉物美之譽，……，中國貨之在南洋亦可獲相當地位。詎意不久以前，日本銀圓價格忽然暴跌，其匯兌率較之中國銀元不相上下，華僑商人已覺不能與之競爭。」駐泗水領事館，〈爪哇華茶市場〉，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8 號 4（1935 年 4 月），頁 61，提到「華幣匯率較日幣為高」，以致華茶不能與臺灣茶競爭。

<sup>206</sup> 《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 4 年號 3（昭和 9 年），頁 34。

<sup>207</sup> 當時香港及中國各地之學者、商人對日貨價格遽然下跌，迭有批評。《南支那及南洋情報》，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儘管華商通商網絡遍布亞洲各地，由於從事貿易的區域及銷售的商品有國貨、日貨之別，交易貨幣也有銀元、日圓的不同，華商在亞洲各地實須面對不同的貿易條件，並向不同的經濟制度挑戰。日本在留華商（居住在日本的華商）可以因經銷日貨至中國、東北亞或東南亞而大發利市，中國商人推銷國貨至東南亞則難免血本無歸。同為華商網絡，兩條商貿路線會有利弊得失、興衰消長的不同變化，背景原因在於所屬貨幣圈不同。日本學者認為，「三〇年代日本並沒有走孤立化的道路，反而通過華僑的通商網絡，與亞洲維持了相互依存關係。所以就日本孤立化而言，……是沒有充分認清亞洲通商網路的作用。」<sup>208</sup>這種說法的爭議不在從無處不在的華商所發揮的地域間聯繫的網絡作用，強調超「國民國家」之跨地域經濟組織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沒有看到跨國家的、超地域的組織仍可能受到「國民國家」的侷限，從而對相關國家的經濟產生不同的效果。<sup>209</sup>

#### （四）對「亞洲間貿易論」與「殖民地工業化論」的評論

有關亞洲經濟史的領域，經濟史學界產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潮流，其中最具有代表的是殖民地工業化論與亞洲交易圈論。殖民地工業化論是重視戰前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工業化急速發展的事實，並認為這是在其他殖民地所未見的。然而日本帝國之能大幅擴張其在南洋的市場，從而造成 1930 年代亞洲貿易量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呈現增長上升的現象，不能忽略日本帝國以產業分工為推進力所展現的侵略本質。<sup>210</sup>亞洲交易圈論的要點為：在十九世紀西歐勢力進入亞洲之前，亞洲已有既成的廣域交易圈，歐美勢力在亞洲有其限制；其後亞洲各國工業化也是以此交易圈存在為前提，1930 年代亞洲貿易相對擴張，只是量的增加，<sup>211</sup>並沒有改變其原有結構，中日同為亞洲工業化

---

第 4 年號 3，頁 34。

<sup>208</sup> 籠谷直人，《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頁 118-120。

<sup>209</sup> 籠谷直人本著自由主義的理念，交易無國界，所以認為遍布各地的華商可以組成互通聲息的華商網絡，並與日本維持相互依存的關係。見氏著，《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頁 42。

<sup>210</sup> 堀和生，〈日本帝國の膨脹と植民地工業化〉，頁 89-119，特別是頁 90-94、106-107 部份。

<sup>211</sup> 杉原薰，〈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頁 98-113。

的領導核心。<sup>212</sup>代表前一說法的堀和生認為，1930年代日本與其殖民地之間的產業分工關係異常緊密，構成日本帝國經濟擴張的堅實基礎，然而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卻有稀薄化的傾向。日本帝國在亞洲經濟圈內對中國及他國殖民地樹立的敵對關係，所展現侵略擴張的本質，早已取代早先亞洲圈內自由貿易國際分工的結構性基礎。相對於「亞洲貿易圈的相對自主性」的說法，他強調「日本帝國經濟圈的相對自主性」。<sup>213</sup>堀和生這一說法，誠如本文第二節所言，只注意到海關貿易報告有關中外貿易的統計，並沒有注意到1930年代日本在華不斷增加的直接投資及大規模走私貿易，對國貨市場造成的影響。換句話說，日本帝國擴張侵略的本質，普遍存在於帝國圈外的亞洲，並不限於其殖民地，且193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經貿關係也不薄弱。日本帝國的擴張，深深影響了中國的工業化，對東南亞的工業化，以及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經貿關係也構成威脅。另一方面，就亞洲交易圈的觀點而言，1930年代日本對東南亞輸出額大幅增長，導致日英關係對立；日本不再對美輸入大量生絲，使得美日間的貿易平衡瓦解。<sup>214</sup>日本帝國圈擴大的結果，有使日本從英美為中心的經濟圈脫離的趨勢，而中國做為區域經濟大國，與英美互相依賴的關係則維持不變，本文第五節末的說明可為明證。排除1930年代的亞洲國際經濟局勢不談，日本在1950年代之後，與英、美之間國際分工的密切關係，遠遠強過其與亞洲各國之間產業分工合作的關係；中國大陸在1950年代之後則因走向社會主義道路，而自絕於西方國際社會。大中華經濟圈與日本帝國經濟圈之興衰消長、此起彼伏的過程，與其對歐美的依賴性高低，似乎是呈反方向的變動。就長時期的發展趨勢看來，我們也可說，隨著二十世紀交通運輸工具趨向便捷，各洲之間聯繫更為緊密，生產條件相近、商品同質

<sup>212</sup> 杉原薰，〈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頁95-156；杉原薰，〈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工業型通貨秩序の建立〉，收入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頁85，註42。

<sup>213</sup> 堀和生，〈日本帝國の膨脹と植民地工業化〉，頁107。

<sup>214</sup> 西川博史講，鍾淑敏譯，〈從歷史觀點看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型塑〉，《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6（1998年9月），頁30。

性高的亞洲各國，對歐美互補依賴的程度愈來愈高。各國對外國際分工的基礎已跨越洲際，而擴大到世界市場的範疇。更趨開放的二十世紀亞洲區域內經貿構造，與較為封閉的十九世紀亞洲經貿構造相比較，其差別可能不只是如杉原薰所說貿易數量增加與否的問題。1930年代亞洲經濟圈之於歐美經濟，不容否認地，仍有其相對的自主性，但處於世界經濟邊陲的位置，所表現愈為深化的邊陲依賴傾向，也自成一格。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 《湖北近代經濟貿易資料選輯》4。武漢：湖北省貿易志編輯室，1986。
-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編，《上海對外貿易》，卷1。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
-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茂新、福新、申新系統》，冊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中村哲著，陳應年等譯，《東亞近代史理論的再檢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上海：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1936。
- 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
- 何炳賢，《中國的國際貿易》。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杜恂誠，《日本在舊中國的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 沈毅，《近代大連城市經濟研究》。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
- 周默秋，《華北五省經濟與英日》。上海：現代國際社，1936。
- 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約翰·伊特韋爾(John Eatwell)、默里·米爾蓋特(Murray Milgate)、彼得·紐曼(Peter K. Newman)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0。
- 夏誠華，《近代廣東省僑滙研究(1862-1949)——以廣、潮、梅、瓊地區為例》。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協會，1992。

- 郭今吾主編，程雨村副主編，《經濟大辭典·商業經濟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 陳公博，《四年從政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章乃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上海：生活書店，1936。
- 游仲勳著，楊建成主編，《華僑政治經濟論》。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4。
- 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二十二年第三季、第四季貿易報告》。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4。
- 實業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二十四年第三季、第四季貿易報告》。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6。
-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三〇年代蘭領東印度之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5。
-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法屬中南半島之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
-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撰，楊建成編，《泰國的華僑》。臺北：中華學術院南洋研究所，1986。
- 潘君祥主編，張今華副主編，全國政協文史辦等編，《中國近代國貨運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 濱下武志著，馬宋芝譯，《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 三菱經濟研究所編，《東洋及南洋諸國の國際貿易と日本の地位》。東京：三菱經濟研究所，昭和8年11月。
- 大西齋，《香港與海南島》。東京：朝日新聞社，1939。
-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中國米》。上海：興亞院華中連絡部，昭和16年。
- 日本商工省貿易局，《阪神在留の華僑と其の貿易事情》。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昭和12年。

- 木村増太郎，《支那經濟恐慌論》。東京：改造社，昭和 12 年。
- 外務省通商局編纂，《米國對支經濟勢力の全貌》。東京：日本國際協會，昭和 15 年。
- 企畫院編纂，《華僑の研究》。東京：松山房，昭和 17 年。
- 米谷榮一，《近世支那外國貿易史》。東京：生活社，昭和 14 年。
- 杉原薫，《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
- 岡崎幸壽，《海運》。東京：ダイセメント社，1938。
- 東亞海運營業部企畫課，《華僑移動狀況》。出版地不詳，東亞海運，昭和 16 年。
- 長野朗，《支那を舞臺の列強資本戰》，收入氏著，《現代支那全集》，卷 5。東京：阪上書院，昭和 13 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産業部編，《北支那經濟綜觀》。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 13 年。
-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華僑調查彙報》，輯 1。上海：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事務所，昭和 15 年。
- 根岸佶，《華僑襍記》。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 17 年。
- 神戸稅關，《神戸在留華僑及其の取引事情》。出版地、出版者不詳，昭和 7 年 8 月。
- 高橋龜吉，《支那經濟の崩壞と日本》。東京：千倉書房，昭和 11 年。
- 細見健三，《北支那の外國貿易と列國の商勢》。東京：學藝社，昭和 12 年。
- 森時彥，《中國近代綿業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
- 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タイ國に於ける華僑》。出版地不詳，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昭和 14 年。
- 福田省三，《華僑經濟論》。東京：巖松堂書店，昭和 15 年。
- 臺灣銀行北頭取息調查課編，《英領馬來經濟事情》。臺北：臺灣銀行北頭取息調查課，昭和 16 年。



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南支南洋貿易概觀》。出版地不詳，臺灣總督官房外事課，出版年不詳。

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南洋華僑調查》。臺北：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昭和14年。

興中公司，《南洋華僑の研究》。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6。

興亞院華中連絡部，《華僑調查中間報告》。昭和16年。

籠谷直人，《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0。

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廣島：溪水社，2001。

Brown, Ian G., ed. *Economics of African and Asia in Inter-war Depression*. London: Routledge, 1989.

Cain, P. J.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Longman, 1953.

Iriye, Akira.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7.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19-1939*. London: Allen Lane, 1986.

Murphey, Rhoads.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3.

Remer, C. 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8.

Salter, Arthur. *China & the Depressi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34.

Cheng, Yu-Kwei. *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 Wash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 D. C., 1956. 中譯本：鄭友揆著，程麟蓀

譯，《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史實的綜合分析》。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

## 二、報紙

- 〈大可注意之日貨運往長江各地〉，《江西民國日報》，1932年7月2日，第5版。
- 〈日人積極擴大長江方面海軍實力援助日商銷（消）滅抵貨運動〉，《時事新報》，1933年5月30日。
- 〈日本棉紗獨佔漢口市場〉，《申報》，1934年4月9日，第8版。
- 〈日本對華航業新計劃〉，《申報》，1933年8月6日，第19版。
- 〈日本積極侵我航權〉，《申報》，1933年7月4日，第10版。
- 〈日美在中國市場之競爭〉，《西北文化日報》，1934年9月8日，第2版。
- 〈日商謀復川江航路〉，《申報》，1934年6月5日，第12版。
- 〈日商謀復長江航業〉，《申報》，1933年6月3日，第11版。
- 〈日商謀復長江航業〉，《申報》，1933年6月14日，第10版。
- 〈日貨運漢漸多，長江日輪復航〉，《申報》，1933年6月1日，第11版。
- 〈日積極侵奪南洋華僑地位〉，《時事新報》，1933年3月20日，第4版。
- 〈何炳賢談華僑南洋貿易〉，《申報》，1934年2月19日，第12版。
- 〈所謂「開發華北產業」與今後華北貿易〉（二），《西北文化日報》，1935年8月7日，第2版。
- 〈長江日輪圖全部復航〉，《時事新報》，1933年5月15日。
- 〈寧府幫助日商攫取在華經濟霸權〉，《福州人民日報》，1933年12月5日，第3版。
- 〈漢口商輸入大批貨品〉，《申報》，1933年5月11日，第7版。
- 〈漢中日貨充斥〉，《西京日報》，1934年8月30日，第6版。
- 〈漢市日貨傾銷〉，《申報》，1933年7月15日，第11版。
- 《大公報》，1934年5月11日，第4版。

畢 森，〈日本最近貿易之優勢〉，《申報》（經濟專刊），1934年12月17日，第14版。

### 三、期刊論文

〈中南航運事業之調查〉，《僑務月報》，卷4期3，1935，頁11-15。

〈檳榔嶼領事館報告〉，《僑務月報》，卷1期5，1934年5月，頁87-130。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中日經濟提攜聲中日本貿易特徵研究〉，《中行月刊》，卷10號3，1935年3月，頁1-13。

方嘉禾，〈最近日英美三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上之地位觀〉，《國際貿易導報》，卷8號4，1936年4月。

西川博史講，鍾淑敏譯，〈從歷史觀點看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型塑〉，《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6，1998年9月，頁28-33。

吳承禧，〈廈門的華僑匯款與金融組織〉，《社會科學雜誌》，卷8號2，1937年6月，頁193-252。

林滿紅，〈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與香港經濟關係的變化——亞洲與世界關係調動中之一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6，2001年12月，頁45-115。

周建言譯，〈日本的南洋政策〉，《中國經濟》，卷5期1，1937年1月，頁117-125。

武育宣，〈九一八後之中日貿易〉，《中國經濟》，卷3期7，1935年7月，頁1-16。

邱致中，〈日貨傾銷南島與日荷會議之前瞻〉，《中南情報》，期1，1934年4月，頁16-27。

前田健次著，漢文譯，〈長江流域對外貿易情勢〉，《中國經濟》，卷3期9，1935年9月，頁1-11。

姚忠華，〈南洋華僑的過去狀況及其衰微之原因〉，《香港華商總會月刊》，卷1期6，1933，頁（甲）49-65。

- 郭 梁，〈1929~33 世界經濟危機對東南亞華僑經濟的影響〉，《南洋問題研究》，1989 年第 1 期，頁 1-10。
- 馮亨嘉，〈最近中日貿易與英美在華市場之爭戰〉，《錢業月報》，卷 15 號 11，1935 年 11 月，頁 17-28。
- 黃寄萍，〈南洋市場受日貨傾銷的檢討〉，《中南情報》，期 5、6，1934 年 8 月，頁 55-59。
- 圓谷弘著，鄧達章譯，〈英日美三國的經濟爭霸戰〉，《中國經濟》，卷 5 期 2，1937 年 5 月，頁 24-47。
- 塗 琳，〈日本南進政策現階段之透視〉，《南洋研究》，卷 5 期 5，1935 年 12 月。
- 劉仰之，〈長江流域的對外貿易之鳥瞰〉，《中國經濟評論》（漢口），卷 1 號 9，1934 年 10 月，頁 75-88。
- 厲 風，〈日本非常時輸出貿易及中國市場〉，《國際貿易導報》，卷 8 號 10，1936 年 10 月，頁 67-84。
- 鄭友揆，〈九一八後二年我國進口日貨分析〉，《社會科學雜誌》，卷 5 期 1，1934，頁 1-42。
- 鄭季楷，〈南洋僑胞之厄運及其出處〉，《僑務月報》，卷 2 期 2，1933，頁 13-21。
- 鄭會欣，〈抗日戰爭前夕日本對華北走私問題初探〉，《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3 年第 4 期，頁 92-99。
- 駐巨港領事館，〈日貨傾銷南洋之概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6 號 1，1933 年 1 月至 3 月，頁 132-134。
- 駐泗水領事館，〈國貨在爪哇市場之消沉與日貨之勃興〉，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6 號 1，1933 年 1 月至 3 月，頁 107-112。
- 駐泗水領事館，〈爪哇華茶市場〉，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 8 號 4，1935 年 4 月，頁 61-64。

- 駐神戶總領事館，〈神戶港之現在及其將來〉，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7號2，1934年2月，頁107-118。
- 駐釜山領事館，〈釜山華僑出口貿易近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7號7，1934年7月，頁43。
- 駐新義州領事館，〈一九三四年上半期內日本棉布輸出之激增狀況〉，南京國民政府編，《外交部公報》，卷7號11，1934年11月，頁300-301。
- 戴一峰，〈閩南華僑與近代廈門華僑經濟的發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4年第2期，頁66-74。
- 謝懷清，〈中日荷印貿易現狀鳥瞰〉，《中南情報》，期8，1934年10月，頁37-43。
- 譚秉文，〈日匯跌落的原因和影響〉，《商業月報》，卷15號2，1935年2月，頁1-6。
- 〈1927~1934年支那對外貿易の回顧〉，《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5年號15，昭和10年，頁7-13。
- 〈上海の外國爲替銀行〉，《經濟月報》（上海商工會議所），卷9號7，昭和10年1月，頁22-29。
- 〈上海を中心とす通商概況〉，《經濟月報》（上海商工會議所），卷10號3，昭和11年3月，頁1-5。
- 〈中華民國と香港の貿易關係〉，《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5年號19，昭和10年，頁9-25。
- 〈支那經濟界と對本邦品貿易の近況〉，《海外經濟事情》，第7年號20，昭和9年，頁5-7。
- 〈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第貳拾參年度後半期事業報告書〉，《經濟月報》，昭和5年號42，1930，頁9-13。
- 〈香港貿易年報〉，《海外經濟事情》，第9年號6，昭和11年3月，頁57-60。
- 〈香港貿易減退〉，《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3年號18，昭和8年，頁30。

- 〈香港貿易概況〉，《海外經濟事情》，第6年號42，昭和8年10月，頁1-2。
- 〈香港貿易概況〉，《海外經濟事情》，第8年號6，昭和10年3月，頁59-60。
- 〈馬來對英本國及英領貿易近狀〉，《南洋協會雜誌》，卷21號3，1935年3月，頁14-26。
- 〈最近に於ける支那海外移民の經濟的地位〉，《滿鐵調查月報》，卷13號6，昭和8年6月，頁153-161。
- 〈新嘉坡は關稅港となるか（一）〉，《南洋時代》，卷4號2，1933，頁52-58。
- 〈過去二十年間的漢口貿易の大勢與昭和七年度の漢口對外、對日貿易〉，《滿鐵調查月報》，卷13號4，昭和8年4月，頁211-222。
- 〈對支貿易を中心としたる大阪對外貿易概要〉，《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號306，昭和7年11月，頁1-9。
- 〈漢口に於ける輸入綿布の推移と相場〉，《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號307，昭和7年12月，頁31-33。
- 〈漢口向日貨増加〉，《海外經濟事情》，第6年號3，昭和8年，頁52-53。
- 〈暹羅市場に於ける日本品の地位（二）〉，《南洋協會雜誌》，卷18號12，1932，頁53-66。
- 〈蘭領印度對香港貿易概況〉，《南支那及南洋情報》，第7年號16，昭和12年，頁37-40。
- 三村哲雄，〈遼西及北支經濟事情〉，《海外經濟事情》，第9年號16，昭和11年，頁147-192。
- 久保亨，〈國民政府の輸出促進政策と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一九三〇年代中國における輸出志向工業化の摸索〉，《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號103，1987，頁81-113。
- 大村得太郎，〈支那經濟界の檢討〉，原件藏愛知大學霞山會館，編號11067。
- 今井駿，〈いわゆる「冀東密輸」についての——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史研究

- の視角から〉，《歴史學研究》，號 438，1976 年 11 月，頁 1-19、37。
- 内田直作，〈自由貿易港としての英領植地香港（二）〉，《支那研究》，號 40，昭和 11 年 3 月，頁 151-186。
- 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天津ニ於ケル日本輸入品ノ奥地流動狀況〉，天調 72 號，昭和 10 年 7 月 30 日，原件藏日本山口大學。
- 枝村榮，〈天津輸入品市の直系配給組織〉，《滿鐵調查月報》，卷 15 號 2，昭和 10 年 2 月，頁 1-12。
- 堀和生，〈植民地帝國日本の經濟構造——一九三〇年代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號 462，2001，頁 26-54。
- 黒松巖，〈支那のボイコットに就て〉，《大阪商工會議所月報》，卷 40 號 618，昭和 10 年 3 月，頁 137-145。
- Akamatsu, K.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Economics*, Preliminary Issue 1, March-August, 1962.
- Friedman, Milton. "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1, 1992, pp. 62-83.
- Halevi, Joseph and Bill Lucarelli. "Japan's Stagnationist Crises," *Monthly Review*, vol. 53, no. 9, Feb. 2002, pp. 24-36.
- Wang, Yen-chien.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China's Monetary Reform in 1935,"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卷 9，冊下，1978，頁 339-363。
- Wong, Lin Ken. "Singapore: Its Growth as An Entrepot Port, 1819~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1, March 1978.

#### 四、專書論文

- 孔華潤，〈美國人領導東亞〉，入江昭、孔華潤編，《巨大的轉變：美國與東亞(1931-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 高事恆，〈中國與南洋貿易之展望〉，收入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編，《南洋商業考察團專刊》。上海：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1936。
- 久保亨，〈幣制改革以降の中國經濟〉，收入野澤豐編，《中國の幣制改革と國際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 中嶋航一，〈日本帝國の食糧需給構造の分析〉，《アジア發展のカオス》。東京：勁草書房，1986。
- 伊藤正直，〈對外經濟關係〉，社會經濟史學會編，《一九三〇年代の日本經濟》。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 佐波宣平，〈支那航域に於ける日英船〉，收入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編，《東亞交通論》，冊1。京都：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昭和17年。
- 杉山伸也，〈日本の綿製品輸出と貿易摩擦〉，收入杉山伸也等編，《戰間期東南アジアの經濟摩擦——日本南進とアジア・歐米》。東京：同文館出版株式會社，平成2年。
- 杉原薫，〈アジア間貿易の基本問題〉，收入氏著，《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
- 杉原薫，〈兩大戰間期のアジア間貿易〉，收入氏著，《アジア間貿易の形成と構造》。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6。
- 杉原薫，〈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工業型通貨秩序の建立〉，收入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廣島，溪水社，2001。
- 松井清，〈日本經濟と南洋貿易〉，收入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編，《東亞貿易論》，冊4。京都：京都大學東亞經濟研究所，昭和17年。
- 清水洋、平川均，〈日本—英領マラヤ間貿易の擴張——シンガポールを中心として〉，《からゆきさんと經濟進出》。東京：コモンズ出版，1998。
- 堀和生，〈日本帝國の膨脹と植民地工業化——東アジア國際關係——〉，收入籠谷直人、秋田茂編，《一九三〇年代のアジア國際秩序》。廣島：溪水社，2001。



葉 淵，〈民信送金與中國經濟〉，收入財團法人南洋協會編纂，《南洋の華僑》。東京：目黒書店，昭和17年。

籠谷直人，〈アジア通商網と日本近代史研究〉，《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0。

##### 五、會議論文

堀和生，〈東亞的兩種資本主義〉，「兩次大戰期間的中國經濟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2001年11月23日。

##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s Economic Core during the Early 1930s: Japan's Expanded Exports and China's Economic Depression

Lee Yu-ping\*

### Abstract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in the 1930s China was just on the margins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not deeply involved with Western economies, and thus that it should not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 though in fact it fell into a deep economic slump.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ic slump of the early 1930s was partly related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of the West but also had other causes. China's depression was also related to Asia, especial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as the crux of the Asian trading network. This article thus illuminates the clos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sia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sian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great world depression's impact on Asia most probably primarily reflected certain regional features of this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an aspect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in past studies.

Before the 1930s,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ic sphere, with numerous small economic spheres encircling it, virtually dominated the Asian economy. With Hong Kong, Singapore, Shanghai, and other major ports for transit goods, these smaller

---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conomic spheres maintained certain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on the one hand, while the same also serving as nodes in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European merchants similarly made use of Chinese trading spheres in East Asia, forming a transit goods and finance center based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for numerous smaller economic spheres situated between the Gulf of Bengal and the South and East Seas. In the 1930s, however, Japan actively expanded its exports, using direct trade routes to maintain close connections with various locations in Asia. This resulted in an overwhelming position for Japanese goods there and finally integrated these various smaller economic spheres into its imperial economic sphere. Japan's strategy not only deprived China of traditional markets for its goods, but also greatly reduced traditional sales of goods imported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This led to the emergence and decline of the two trading networks and routes referred to here, and also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ic sphere and the subsequent disappearance of the previously-existing smaller economic spheres. The shift in the Asian economy from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ic sphere, which consisted of multiple economic and trading spheres, to that of Japan's imperialistic economic sphere which was monopolistic, aggravated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pression. Just at this time China was faced with Japan's emergent imperialism as the center of the Asian economic order was decisively transferred from China to Imperial Japan.

Many Western scholars held the view that the silver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30s contributed to the outflow of large amounts of silver from China, which then severely harmed its economy plunging it into the world economic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we also saw the replace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by the U. S. to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untry in Asia's global economic order. It is true that the silver policy of the U. S., now Chin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mportantly con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pression; however, this did not mean that Japan, as the second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had no role in affecting China's economic crisi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Japan's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exports in

the 1930s, pricing goods cheaply but selling high volumes and thus accepting low profit margins but building a bigger share of the market, hurt Chinese domestic manufacture. Although the total amounts of Japanese trade value were smaller than those of America, Japanese exports were enough to serious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goods" and thus form a basic cause of the depression in China's economy. Compared to Western historical views of the silver crisis as a cause of China's economic crisis, the dumping of Japanese goods can be said to be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from an Easter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rounded in Asia.

**Keywords: The Great Depression, Asian economic order, bloc economy,  
Japan, Greater China economic sphere, regional economic centers,  
theory of colonial 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of intra-Asian trade**